

彼得·蒂尔

彼得·蒂尔最新长访:人工智能、火星和永生: 我们的梦想足够大吗?

主持人: 硅谷是否过于野心勃勃? 我们应该更害怕什么? 世界末日还是停滞? 为什么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会担心敌基督? 今天我的嘉宾是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 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和J.D. 瓦恩斯的早期政治投资者。彼得·蒂尔是原始的科技右翼权力玩家。他因资助一系列保守派和反传统的想法而广为人知。但是我们要讨论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尽管有亿万富翁的轻微劣势, 但他成为过去2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右翼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彼得·蒂尔, 欢迎来到有趣的时代。

彼得·蒂尔: 感谢邀请我。

主持人: 不客气。感谢您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开始时带您回到过去。大约13到14年前, 你为《国家评论》撰写了一篇题为《未来的终结》的文章, 这是一份保守派杂志。基本上, 这篇文章的论点是, 动态、快节奏、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动态。实际上, 我们进入了一个技术停滞的时期, 那种数字生活是一种突破, 但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大, 它让这个世界基本上有些停滞。你并不是唯一提出这种论点的人, 但由于你是一个在数字革命中致富的硅谷内部人士, 这一观点从你那里表达出来尤其有效。所以我很好奇, 在2025年, 你认为这个诊断依然成立吗?

彼得·蒂尔: 是的。我仍然广泛相信停滞论。这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论点。所以这个主张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停滞不前。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关于速度减缓的说法。并不是说是零, 而是从1750年到1970年, 再到200多个年份, 是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时期, 我们是 relentless。我们在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船的速度更快。铁路的速度更快。汽车的速度更快。飞机的速度更快。这 culminates 在协和号和阿波罗任务中。然后在各个维度中, 事情减缓了。

我总是对位元的世界做了一个例外。所以我们有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然后, 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 你有了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革命, 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大的。但问题是, 是否真的足够让我们走出这种普遍的停滞感?

而且, 有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可以从关于回到未来的论文开始讨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停滞还是加速呢? 因为晚期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人们的高度专业化。所以, 你能说除非你将一生的一半时间投入到弦理论的研究中, 否则我们在物理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吗? 或者量子计算机又怎么样, 癌症研究和生物技术又是怎样的, 所有这些垂直领域呢? 然后, 癌症的进展和弦理论相比, 究竟该算多少? 因此, 你必须给所有这些事情赋予权重。所以理论上,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 难以回答的事实让我们有更狭窄的保护者群体在保护自己, 这是否自我导致了怀疑? 所以, 是的, 我认为总体来说, 我们, 我们仍然处在这个相当停滞的世界中。

主持人: 这并不是完全的停滞。是的, 你提到了《回到未来》, 我们刚刚给孩子们看了原版的《回到未来》, 第一部, 迈克尔·J·福克斯主演的。

彼得·蒂尔: 福克斯。当然，它是从195到1985，30年前。然后第二部《回到未来》是从1985到2015，现在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有飞行汽车。

主持人: 而2015年的未来与2015年的未来有很大的差异，确实有比夫·塔嫩（Biff Tannen）这样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式人物在某种权力中。所以它有某种新闻发布。但确实，最明显的事情是建筑环境看起来有多么不同。所以我听到的最强有力的停滞论证之一是，没错，如果你把一个人从各个时间点放入时光机，他们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他们离开1860年。或者从1890年到1970年，这大约是你一生中的80年，差不多。但是，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即使作为2025年的孩子。看1985年，感觉汽车有点不同，而且没有人用手机，但这个世界似乎相对相似。所以这是一种非统计性的，但我认为……这是常识。这是常识的理解。

那么，有什么能让你相信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腾飞时期？仅仅是经济增长吗？是生产力增长吗？比如说，你们关注的停滞与活力的数字是什么？

彼得·蒂尔: 当然。经济数字就是，生活标准与你父母相比如何？如果你是一个30岁的千禧一代，或者说，与你的婴儿潮一代父母30岁时相比，你过得怎么样？他们当时过得如何？这是一些智力问题。我们有多少突破？我们如何量化这些东西？投入研究的回报是什么？研究确实存在边际回报递减的问题，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学术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看起来像一个反社会的马尔萨斯主义机构，因为你必须在某些事情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才能获得相同的回报。在某些时候，人们放弃了，这个事情就崩溃了。好吧，对。

第二章：停滞的代价与对风险的渴求

主持人: 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增长和活力？因为正如你在某些论点中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种文化变化，你认为事情放缓，开始停滞，人们对增长的成本变得非常焦虑，尤其是环境成本。而这个观念是，你知道的，你最终会形成一种广泛共享的观点，即我们算是足够富有了。如果我们过于努力追求更富有，地球将无法支撑我们。我们会遭遇各种形式的退化，我们应该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么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呢？

彼得·蒂尔: 我认为停滞发生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总是有三个问题。你被问及历史。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应该如何处理它。但还有一个中间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人们缺乏创意。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机构退化并变得规避风险，还有这些文化转型我们可以描述。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未来也有一些非常合理的担忧，如果我们继续加速进步，是在朝着环境大灾难或核灾难等方向加速吗？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回到未来的方法，我确实认为社会。我不知道，它会 unravel（解体），它不再有效。我会把中产阶级定义为那些期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当这种期望崩溃时，我们就不再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也许有某种方式可以让一个封建社会处于静止和停滞的状态，或者也许有某种方式可以转变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但这不是方式，绝不是，西方世界也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美国在其存在的前200年里运作的方式。

主持人: 所以你认为普通人最终不会接受停滞吗？他们会反抗，在这种反抗过程中会试图破坏周围的事物。

彼得·蒂尔: 他们可能会反抗，或者我们的制度不再有效。我们所有的制度都是以增长为基础的。对。我们的预算确实是以此为基础。基于增长。是的，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里根和奥巴马，里根是某

种消费者资本主义，这真是自相矛盾。你借钱，作为一个资本家，你不存钱，你借钱，而奥巴马则是低税收社会主义，跟里根的消费者资本主义一样自相矛盾。而且，是的，我喜欢低税收社会主义，比高税收社会主义好得多。但是我担心这不可持续。在某个时刻，你要么税收上升，要么社会主义结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他们并不乐观。他们不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某种稳定的，你知道的，格蕾塔的未来。也许它可以运作。

主持人: 这是格蕾塔·滕伯格。为了明确，这是指格雷塔·图恩伯格，这位以反气候变化抗议闻名的活动家。在您看来，我会说她代表了一种反增长的象征，实际上是一个由环保主义者主导的专制未来。

彼得·蒂尔: 当然，但我们还没到那一步。我们还没到那一步。您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社会。

主持人: 如果您真的陷入其中。如果您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去增长的环境中，您知道，像小型斯堪的纳维亚村庄一样。我不确定那是否会像北朝鲜，但肯定会非常压抑。一件总是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当您感到停滞、颓废的感觉时，您会发现人们最终会渴望一种危机，渴望有那么一刻到来，他们可以彻底改变社会的现状。因为我倾向于认为，丰富社会后，当人们达到一定的财富水平时，他们变得非常舒适，变得厌恶风险，而要从颓废中走出来进入新的事物，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危机就很难做到。对我来说，最初的例子是九月十一起。在对外政策的保守派中，存在这样一种心态，认为我们一直在颓废和停滞，现在是我们觉醒并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重塑世界的时候，显然那最终的结果非常糟糕。但有些类似的事情。布什43号只是告诉人们立即去购物。

彼得·蒂尔: 所以这还不够反颓废？大多数情况下是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小圈子，人们在其中表演角色，以此来摆脱颓废。但主导因素是布什43岁团队的人，让人们只是去购物。

主持人: 那么，你愿意冒哪些风险来逃避颓废？似乎在这里存在一种危险，想要反对颓废的人不得不承担很多风险。他们必须说，看看，你有这个美好、稳定、舒适的社会，但你猜怎么着？我们想要一场战争或危机，或者政府的完全重组等等。他们必须迎接危险，

彼得·蒂尔: 我不知道我是否必须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给你一个精确的答案，但我的方向性答案是更多。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风险。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不知道，我可以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如果我们看生物技术，比如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在40到50年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人们完全被β-淀粉样蛋白困住了。显然这不起作用。这只是一种愚蠢的骗局，人们只是自我强化。所以，是的，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承担更多风险。

主持人: 好的，我想请你保持具体，我想在这个例子上停留一下，问一下，好的，在抗衰老研究中，我们需要承担更多风险，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FDA必须退后一步，说任何拥有阿尔茨海默病新疗法的人可以，知道吧，继续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像这样的，医疗领域的风险是什么样的？

彼得·蒂尔: 是的，如果你有一些致命的疾病，你会承担更多的风险，你知道的，可能有很多更多的风险你可以去承受。研究人员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从文化上看，我想象的样子是早期现代性，那时候人们，相信我们会治愈疾病，他们认为我们会有根本的延长生命。不朽就是，这也是早期现代性项目的一部分。是弗朗西斯·培根、孔多塞，你知道的，也许这并不是反基督教的，也许它是基督教的延续，具有竞争性。如果基督教承诺你身体的复活，科学就是。不会成功，除非它承诺你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我，我不知道，我记得1999年到2000年，当我们在运营paypal时，我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卢克知道，他对阿尔科尔和冷冻技术很感兴趣，人们应该冷冻自己。我们有一天把整个公司带到一个冷冻

派对，保鲜盒派对，人们在冷冻派对上销售保鲜盒的保单，他们出售的是，只是你的头部将被冷冻，你可以选择全身冷冻或只是头部，头部的费用更便宜。

当针式打印机没有正常工作时，这让人感到不安，所以冷冻保单无法打印出来。但从现在看来，这仍然是……再一次的技术停滞，对吧。但这也是衰退的一个症状，因为在1999年，这并不是主流观点，但仍然有一些边缘的婴儿潮一代观点，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永生。这就是最后一代。所以我一直反对“婴儿潮”一代，但也许在这种边缘化的婴儿潮自恋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至少有一些婴儿潮一代的人仍然相信，科学能够治愈他们所有的疾病。没有任何千禧一代的人再相信这一点了。

第三章：作为风险投资的特朗普主义

主持人: 我认为现在有些人相信一种不同的永生，对吧。我认为对人工智能的迷恋部分源于一种超越限制的特定愿景。我想问你这个。阿斯特拉，我想问你关于政治的事。因为我对你最初关于停滞的论点感到印象深刻，这主要是关于技术和经济的，我认为它可以应用于相当广泛的事物。在您撰写那篇论文时，您对这种概念感兴趣，即实质上建立独立于僵化体制的新政治体。西方世界。但是你在2010年代做了一个转变。所以你是在2016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少数几位杰出的硅谷支持者之一，可能还是唯一的。你支持了几位经过仔细挑选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其中一位现在是美国副总统。我作为观察者对你们所做事情的看法是，你们基本上是在为政治进行某种风险投资，你们在说，这里有一些可能改变政治现状的颠覆性力量，而这种风险是值得的。你是这样想着的吗？

彼得·蒂尔: 当然，有各种层面的考虑。我是说，一个层面是，确实有希望能够将泰坦尼克号从它正驶向冰山的航道上转向，或者用其他的隐喻来说，真正改变社会的航向。通过政治变革。也许更狭窄的、更具体的愿望是，我们至少可以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一些对话。当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时，这是一种积极、乐观、雄心勃勃的议程，还是对我们现状的非常悲观的评估，即我们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对特朗普会做出积极的举动没有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我至少认为，在一百年来的第一次，我们有一个不会给我们这种甜腻的布什胡言乱语的共和党人。这并不是进步，但我们至少能进行对话。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荒谬的幻想。我在2016年有这两个想法，你知道的，这些想法常常在你意识的边缘徘徊，但我没有办法将这两个想法结合起来，第一，我知道，没有人会因为我支持特朗普而生我的气，如果他输了；第二，我认为他有50%的胜算。然后，我有一个隐含的想法，为什么如果他输了没人会对你生气呢，那将是如此奇怪，而且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好吧，然后，但后来我想，他还有更多，我认为他有50-50的机会，因为问题很深，停滞令人沮丧。然后我想象的场景是，如果他赢了，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现实是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然后，也许，我们已经进步到在2025年这个时候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特朗普十年后。

主持人: 当然，你并不是那种僵尸般的左翼人士，罗斯，但这就是，我被称为过许多东西，彼得。

彼得·蒂尔: 我会接受我能得到的任何进步。

主持人: 从你的角度来看，假设有两个层面，有一种基本的感觉，这个社会需要破坏。它需要风险。特朗普就是破坏。特朗普就是风险。第二个层面是特朗普实际上愿意说一些关于美国衰退的真相，作为一名投资者，也作为风险投资家，您觉得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有什么收获吗？

彼得·蒂尔: 那么特朗普在他第一任期内做了什么让您觉得是反低迷或反停滞的呢？如果有的话，也许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这花了更长的时间，进展也比我预期的要慢，但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方，很

多人认为情况出现了问题，而这并不是我在2012年时所参与的讨论。2013年，2014年。我在2012年与埃里克·施密特辩论，在2013年与马克·安德森辩论，在2014年与贝索斯辩论。我认为存在一个停滞问题，而他们的观点都是，一切都很好。我认为，至少这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更新和调整。硅谷已经进行了调整。

主持人: 不过，硅谷不仅仅是调整，硅谷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停滞的问题。关于停滞的问题。但随后，硅谷的大部分最终在2024年支持了特朗普，包括显然最著名的埃隆·马斯克。

彼得·蒂尔: 是的，而这与停滞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总是非常复杂，但我想说的是，我不，再次强调，我很犹豫发言代替所有这些人，但像马克·扎克伯格或Facebook元这样的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并不是非常意识形态化。他并没有深思熟虑这些事情。默认的立场是自由主义。而且总是会问，如果自由主义不起作用，你该怎么办？多年来都是这样，你做得更多。如果某件事不起作用，你只需要再多做一些。你增加剂量，增加剂量，花费数亿美金，变得完全觉醒，而每个人都讨厌你。在某个时候，好吧，也许这不起作用。所以他们转变了。是的。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

主持人: 这不是支持特朗普的事情。这不是支持特朗普的事情。但在公共和私下的对话中，有一种感觉，即特朗普主义和民粹主义在2024年可能并不如2016年，当时，彼得在那里作为唯一的支持者。但现在在2024年，它们可以成为...技术创新、经济活力等等的载体。这...

彼得·蒂尔: 你在这里的框架实在太过乐观了。所以我...人们，我知道你是悲观的。当你如此乐观地框架时，实际上是在说这些人会感到失望，他们注定要失败之类的。

主持人: 人们表达了很多乐观。我只是这样说。埃隆·马斯克表达了很多.....他对预算赤字将如何杀死我们表达了一些末日焦虑。总之，他和他周围的人进入了政府，基本上说我们与特朗普政府有合作关系，我们正在追求技术伟大。我认为他们是乐观的。所以我，你是从一个更悲观或现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想问，你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评估是什么，不是他们的评估，而是你认为，特朗普2.0中的民粹主义在你看来是否是技术的一个载体？对你来说，技术活力？

彼得·蒂尔: 这仍然是我们拥有的最佳选择。我不认为，哈佛会通过继续做过去50年没有成功的事情来治愈痴呆症吗？

主持人: 这只是一个证据，说明情况无法变得更糟，让我们进行颠覆，但目前对民粹主义的批评是，硅谷与民粹主义者结盟，但最终，民粹主义者不关心科学，他们不想花钱在科学上，他们想削减对哈佛的资金，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哈佛，最终，你不会获得硅谷所希望的未来投资。这错了吗？

彼得·蒂尔: 是的，但我们必须 kembali 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个科学在背后运作得怎么样？这正是，新政者，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大力推动科学，你资助了它，你给人们提供了资金，并且你扩大了它。而且，今天如果有一个相当于爱因斯坦的人写信给白宫，那封信在邮件室里会被丢失，曼哈顿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称某件事情为“登月计划”，就像拜登谈论癌症研究时所说的“登月计划”。在60年代，这仍然意味着你真的去了月球。现在“登月计划”意味着一些完全虚构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你需要一个登月计划来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阿波罗计划。这意味着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

主持人: 但看起来，对于你来说，你仍然处于一种模式，与硅谷其他一些人相比，民粹主义的价值在于揭开面纱和幻觉。我们目前并不一定处于你期待特朗普政府进行曼哈顿工程或月球计划的阶段。更像

是民粹主义帮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假的。

彼得·蒂尔: 你需要尝试两者兼顾。而且它们之间是非常纠缠的。我不知道, 现在核能正在去监管化。在某个时刻, 我们会重新开始建设新的核电站, 或者更好的设计, 甚至可能是聚变反应堆。所以, 是的, 这是一种去监管的、去构建的部分。然后在某个时刻, 你实际上会开始建设。一切都像这样。所以, 是的, 在某种程度上, 你是在清理场地, 然后。

第四章: AI、火星与进步的幻觉

主持人: 但你, 可能, 但你个人已经停止资助政治家。

彼得·蒂尔: 在这些事情上, 我的想法是矛盾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而且极具毒性, 所以我, 我, 我往返于这个问题上, 所有参与的人都是零和游戏, 这太疯狂了, 然后在某种程度上, 因为每个人都恨你并把你和特朗普联系在一起, 这对你个人来说又是怎样的毒性呢? 这是因为它处在一个零和的世界中。参与其中的风险感觉真的很高。你最后会拥有以前没有的敌人吗? 这对所有以不同方式参与的人来说都是有毒的。

回到未来是有政治维度的。你不能, 我不知道, 这是我在24号和埃隆谈过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过这些, 我和埃隆有过这种海上定居的版本, 我说, 如果特朗普没赢, 我想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埃隆说, 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地方可去。这是唯一的选择。然后, 你总是在后来想出正确的论点。大约在我们吃过晚餐、我回到家两个小时后, 我想, 哇, 埃隆, 你不再相信去火星了。2024。2024年是埃隆不再相信火星的年, 不是作为一个愚蠢的科技项目, 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项目。火星本 supposed 是一个政治项目, 是在建立一个替代方案。在2024年, 埃隆开始相信如果你去火星, 知道的, 那是社会主义美国。政府, 觉醒的人工智能, 它会跟随你到火星。

是德梅斯和埃隆的会面我们促成的。他在做深度思维。这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是的, 这次粗略的对话是, 德梅斯告诉埃隆, 我正在世界上进行最重要的项目。我正在建设一个超人类的人工智能。埃隆回应德梅斯。好吧, 我正在进行世界上最重要的项目。我正在将我们变成一个星际物种。然后德梅斯说, 好吧, 我的人工智能将能够跟随你到火星。然后埃隆就稍微安静了。但在我对历史的叙述中, 这花了几年时间。这真的让埃隆感受到。他花到2024年才处理这个。

主持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相信火星。这只是意味着他决定必须在预算赤字或觉醒问题上赢得某种战斗才能到达火星。

彼得·蒂尔: 火星意味着什么? 是的, 火星是, 还是说, 它...火星意味着什么? 它是, 是, 它只是一个科学项目, 还是说, 我不知道, 它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 一个新社会的愿景? 是的。时间线, 月球作为一个自由意志者的乐园或者类似的东西。我不确定是否特别具体化了, 但如果你具体化事物的话, 也许你会意识到火星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它应该是一个政治项目。然后当你具体化它的时候, 你必须开始思考, 好吧, 觉醒的人工智能会跟随你, 社会主义政府也会跟随你。然后也许你不得不做一些除了去火星以外的事情。好吧, 所以觉醒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 人工智能看起来, 如果我们仍然停滞不前, 它就是停滞的最大例外之一。这是一个有着显著进展的地方, 令人惊讶的进展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这也是我们刚刚谈论政治的地方。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人工智能投资者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 包括既不干预又进行公私合营。因此这是一个进展和政府参与的区域。而你是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你认为你在投资什么?

彼得·蒂尔: 我不知道, 有很多层次。我确实认为, 我知道, 有一个我们可以框定的问题就是我认为AI有多重要? 而且, 我不知道, 我的愚蠢答案是, 它介于不算什么和彻底改变我们社会之间。所以我的占位符是, 它大致在90年代末互联网的规模上, 您知道, 我不确定这是否足以真正结束停滞。它可能足以创造一些伟大的公司。而互联网可能每年为GDP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 持续了10到15年。它提高了某些方面的生产力。所以这大致是我对AI的占位符。

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这种不平衡有点不健康。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東西。我希望有更多的多维进步。我希望我们前往火星。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治疗痴呆症的方法。如果我们只有人工智能, 我会接受。这有风险。显然, 这项技术有其危险性。

主持人: 所以你是个怀疑论者。但你对你可能称之为超级智能级联理论持怀疑态度, 这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人工智能成功, 它会变得如此聪明。它会为我们在原子世界中带来进步。比如说, 好吧, 我们无法治愈痴呆症。我们无法, 弄清楚如何构建完美的工厂, 生产前往火星的火箭, 但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在某个时刻, 你会越过一个特定的阈值, 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数字进步, 还有64种其他形式的进步。听起来你并不相信这一点, 或者你认为这不太可能。

彼得·蒂尔: 是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一个限制因素。这是什么意思, 限制因素? 这可能是一种硅谷意识形态, 也许在某种奇怪的方式上, 它比保守派的观点更自由, 但人们在硅谷确实对智商非常关注, 认为一切都与聪明人有关。对。如果你有更多聪明的人, 他们就会。会, 他们会做伟大的事情。然后经济学上的反智商论点是, 人们实际上表现得更差。他们越聪明, 表现得就越差。他们, 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些, 或者我们的社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 他们也不符合这些标准。所以这表明, 限制因素不是智商, 而是我们社会深层次存在的问题。

主持人: 所以我不-这是对智力的限制, 还是人类超级智能所创造的人格类型的问题。我对这个想法非常同情, 在我和一个AI加速主义者进行的播客一集中, 我提出了这个观点, 某些问题如果你提高智力就可以得到解决。就像我们提高智力, 哗的一声, 阿尔茨海默病就解决了。我们提高智力, AI就能找出自动化流程, 帮你在一夜之间建造出十亿个机器人(17.300, -0.09, -0.52%)。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理性的怀疑者。我认为, 这可能有一定的限制。

彼得·蒂尔: 很难证明某种方式。证明这些事情总是很难。直到我们拥有超智能。我和你有相同的直觉, 因为我认为我们有很多聪明的人, 而事情却因其他原因停滞不前。因此, 也许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也许根本没有治愈痴呆症的方法, 且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死亡是没有治疗办法的。也许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这和文化因素有关。因此, 问题不在于个人的聪明, 而在于这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否容忍异端的聪明人? 也许你需要异端的聪明人来进行疯狂的实验。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传统的聪明。如果我们重新定义觉醒主义, 觉醒主义太意识形态化, 但如果你把它定义为从众, 那也许这不是能够带来变化的聪明。

主持人: 所以你是否担心一个可行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中, AI以某种方式变得停滞不前? 它就像是高度智能, 以从众的方式具有创造力, 这就像你知道的, Netflix算法。它制作无限量的还可以的电影供人们观看。它生成无限的还可以的想法。它使一群人失业并使他们变得过时, 但在某种程度上, 它加深了停滞。这是, 你的恐惧吗?

彼得·蒂尔: 是的, 就像人们只是在外包。这完全有可能。这确实是一种风险。但我想, 我的结论是, 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尝试AI, 否则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的停滞。所以, 是的, 确实有各种有趣的事情

将要发生。好吧，也许在军事背景下，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结合，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危险或反乌托邦，也许会改变某些事情。但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哇，那真的就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互联网版本，互联网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遵从和更多的觉醒？是的，有很多方式表明，它并没有导致自由意志主义者在1999年幻想的那种丰富多样的思想爆炸。但逆向而言，我会认为这仍然比替代方案要好，如果我们没有互联网，也许情况会更糟。人工智能更好，它比替代方案要好。替代的选择根本没有，因为这个统计数据看，这里有一个地方是停滞论者的观点仍然得到支持，我觉得我们只在讨论人工智能这一点，始终隐含着这样一个承认：没有人工智能的话，我们几乎处于完全的停滞状态。

第五章：超人类主义、宗教与敌基督的降临

主持人: 但人工智能的世界明显充满了人们，这些人至少似乎对技术持有一种更乌托邦的、变革性的，不管你想用什么词来形容它的观点，比你在这里表达的更积极，你之前提到现代世界曾经承诺过激进的生命延长，而现在不再如此。在我看来，许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的人把它视为一种超人类主义的机制，一种超越我们肉体的方式，或者是某种成功的物种的创造，或者是心灵与机器的合并。你认为这只是一无关紧要的幻想吗？还是你认为这只是炒作？你认为人们是在通过假装我们要建造一个机器神来筹集资金，是炒作吗？是妄想吗？这是你担心的事情吗？

彼得·蒂尔: 我认为你希望人类能够生存下去，对吧你有些犹豫，好吧，我是的，我不知道，我会，我会这是个漫长的犹豫，有很多，有很多隐含的问题人类应该存活吗是的，好吧，但是我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总是，我不知道超人主义是这样的，理想是这种激进的转变，你的人类自然身体被转变为一个不朽的身体，有一种批评，假设在性相关的背景下，或者我不知道，变装者是指那些改变衣服和穿异性服装的人，而变性者是指那些把阴茎变成阴道的人，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那些手术效果如何。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转变。批评并不是说这很奇怪和不自然。而是，伙计，这实在是太少了。好吧，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易装或改变性器官。我们希望你能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思想，甚至改变你的整个身体。然后，或者某种东西，东正教基督教对这一点的批评是，这些事情没有走得足够远，比如说超人类主义只是改变你的身体，但你还需要转变你的灵魂，转变你整个自我。是的，但其他的...

主持人: 等等，抱歉。我通常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你相信宗教应该是科学和科学进步理念的朋友。我认为任何关于神圣天意的观点都必须包含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这些在我们的祖先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似乎仍然是，基督教的最终承诺是通过上帝的恩典获得完美的身体和完美的灵魂。而那些试图依靠一堆机器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很可能会沦为反乌托邦式的人物。好吧，我们来明确一下。你将会有一种异端的基督教形式，对吧，它宣称其他的东西。

彼得·蒂尔: 我不知道。我认为“自然”这个词在旧约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词，换句话说，我理解的，你知道犹太基督教的启示是，它是关于超越自然，是关于克服事物的，最接近自然的说法是，人是堕落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自然的状态，就是你很糟糕，这是真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靠着上帝的帮助，你应该超越这些，克服这些。

主持人: 但是人们，如果你只是说你被接受了，当然包括在场的各位，大多数在建设假想机器神的人并不认为他们在与耶和华、耶稣基督、万军之主合作。他们认为，他们是在独立地建立不朽，是吗？

彼得·蒂尔: 我们在跳来跳去, 很多事情。所以再次提到, 我所说的批评是他们不够雄心壮志。不够。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 这些人并不够雄心勃勃。现在, 我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他们还在吗? 但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并没有足够的雄心。那他们在身体上还有足够的雄心吗? 他们还真的算是超人类主义者吗? 而这就是, 好的, 人, 冷冻保存的事情, 这看起来像是1999年的复古东西。其实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并不是超人类主义者。物理身体, 然后好吧, 也许这不是关于冷冻保存, 也许是关于上传, 虽然好吧, 这并不完全, 我更愿意拥有我的身体, 我不想只是一个模拟我的计算机程序, 所以上传似乎是冷冻保存的一种退步, 但即便如此, 这也是对话的一部分, 而这就变得非常难以评分, 我不想说他们都是在编造的, 一切都是假的, 但我, 我不认为你认为其中一些是假的? 我不认为这是假, 意味着人们在说谎, 但我想说这并不是重心。

是的。所以, 确实, 有一种丰盈的语言。有一种乐观的语言。我几周前和埃隆进行的对话是, 他说, 我们将在美国拥有十亿个人形机器人。在10年内。我说, 好吧, 如果这是真的, 你就不需要担心预算赤字, 因为我们将会有如此巨大的增长。增长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 他仍然担心预算赤字。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相信有十亿个机器人, 但这暗示着, 也许他没有考虑周全, 或者他觉得这不会在经济上产生如此大的变革, 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误差范围。但确实,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事情的考虑并不是很周全。

如果我必须对硅谷做出批评, 那就是, 他们总是对技术的意义感到困惑, 而且他们的对话往往会陷入微观的细节中, 就像“AI的智商ELO分数是多少?” 以及“你到底如何定义AGI?” 我们会陷入这些无休止的技术辩论中, 而实际上有很多处于中间层次的重要问题, 比如, 预算赤字意味着什么? 这对经济意味着什么? 这对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样, 这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点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没有考虑人工智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没有考虑这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而这些正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探讨的问题。

主持人: 这也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 你感兴趣的, 我们在这里稍微谈谈宗教话题。你最近一直在发表关于反基督者概念的演讲, 这是一个基督教概念, 也是一个启示论的概念。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反基督者是什么?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论反基督者。

彼得·蒂尔: 好吧, 我可以谈论很长时间, 但我认为, 总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阐明这些存在主义风险以及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它们都被框架成一种失控的反乌托邦科学文本。有核战争的风险。有环境灾难的风险, 也许是一些具体的。比如气候变化, 尽管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有生物武器的风险。你有各种不同的科幻场景。显然, AI也存在某些类型的风险。

但我总是认为, 如果我们要谈论存在风险的框架, 也许我们应该谈谈另一种类型的坏奇点的风险, 我称之为单一世界的极权国家。因为我认为, 人们对所有这些存在风险的政治解决方案, 默认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一个世界治理。我们该如何处理核武器?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有权威的联合国来控制它们。而且它们是由国际政治秩序控制的。然后, 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处理人工智能, 我们需要全球计算治理吗? 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控制所有计算机, 记录每一个按键, 以确保人们不编程出危险的人工智能。我一直在想这是否有点从锅里跳进火里。

所以无神论者的哲学框架是: 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这是由美国科学家联盟在40年代末发布的一部短片, 开头是核弹摧毁了世界, 显然你需要一个全球政府来阻止这一切, 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而基督教的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样的问题, 是反基督还是世界末日。你要么接受反基督的一个世界国家,

要么我们在无意识中走向世界末日。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反基督或世界末日，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样的问题。

现在，我对此话题有很多想法，但有一个问题，这在所有这些反基督的书中都是一个情节漏洞。人们写道，反基督是如何掌控世界的？他发表这些恶魔般、催眠般的演讲，人们就会相信。所以这是一个情节漏洞。这就是这个恶魔。这完全不合理。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情节漏洞。对。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这个情节漏洞的答案。抗基督统治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谈论世界末日。不停地谈论存在风险，这就是你需要规范的内容。

这与17、18世纪培根主义科学的图景正好相反，那时的抗基督像某个邪恶的科技天才、邪恶的科学家，发明这种机器来统治世界。人们对此太害怕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具有政治共鸣的事情正好相反。这是，确实是，有政治共鸣的是我们需要停止科学。我们需要对这件事说停。而这就是，我不知道的地方。在17世纪，我可以想象一个像斯特兰奇医生、爱德华·泰勒那样的人在掌控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可能性更大。更可能是格雷塔·通贝里。

主持人: 好的，我想建议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找到一个折中方案。过去，人们合理地害怕反基督者是一种技术巫师，而现在，合理的恐惧是某个承诺控制技术、让其安全的人，从你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似乎会 usher in 一种普遍的停滞。

彼得·蒂尔: 这更像是我对事情发生方式的描述。

主持人: 所以我认为，人们仍然害怕17世纪的反基督者，我们仍然害怕奇异博士的生活，但你所说的，真正的反基督者会利用这种恐惧，并说你必须跟我走，以避免天空网，以避免终结者，以避免核灾难，是的，我的看法是，从现在的世界来看，你需要某种新颖的技术进步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所以如果世界相信人工智能即将摧毁所有人，我可以理解世界会转向某个承诺和平与监管的人，但我认为要达到那一点，你需要其中一个加速主义的末世情景开始发挥作用，为了实现你的和平与安全的反基督教，你需要更多的技术进步。比如，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一个关键失败是它面临知识的问题。它无法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所以你需要人工智能或其他东西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极权统治。所以你难道不认为，基本上你需要你的最坏情况涉及某种进步的爆发，然后被驯服并用来强加停滞的极权主义吗？你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到达那里。就像格雷塔·通贝里在地中海的一艘船上，就像在抗议以色列。我只是不觉得从人工智能、科技，甚至气候变化中获得安全的承诺现在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普遍的号召力是有可能的。缺乏加速变化和对彻底灾难的真实恐惧。

彼得·蒂尔: 这些事情很难打分，但我认为环保主义相当有力量。我不知道它是否绝对强大到足以创建一个全球的极权国家。但是，天哪，它是的。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式下并不是。它确实是。我想说这可能是人们唯一的想法，未来是一个远比其他想法强大的未来的概念。在一个衰退、腐朽的欧洲，这里并不是世界上的主导玩家。这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对。

然后我会，我不知道，我们有着这段非常复杂的核技术历史。而且，我们，好吧，我们没有，是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极权的一体化世界国家。但是，到1970年代，有一种关于停滞的说法是，技术的失控进展变得非常可怕，并且，培根式科学，在洛斯阿拉莫斯结束了。然后，好吧，它在那结束了，我们不想再有更多。而且，当查尔斯·曼森在60年代末服用LSD并开始杀人时，他在LSD下所看到的，他所学到的是，你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英雄一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有事情都是被允许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变成了查尔斯·曼森。但在我对历史的叙述中，每个人都变得和查尔斯·曼森一样疯狂。

主持人: 但是查尔斯·曼森并没有成为反基督者并接管世界, 我只是说, 我们正在结束, 正在以末世为结尾。

彼得·蒂尔: 不, 但是我对1970年代历史的叙述是嬉皮士确实赢了。我们没赢。我们在1970年代7月登上了月球。1969年, 伍德斯托克在三周后开始, 从后见之明来看, 那时进步停止了, 而嬉皮士赢了。是的, 这并不是字面上的查尔斯·曼森。

主持人: 好吧, 但你正在退缩, 你只是, 我想坚持反基督者的主题来结束, 因为, 你正在退缩, 你在说, 好吧, 环保主义已经是亲停滞等等。好吧, 让我们, 来吧, 同意这些。我只是在说这些事情很有力量。我们现在并不生活在反基督者的统治下。我们只是停滞不前, 你在暗示可能有更糟的事情即将来临, 这将使停滞变得永久, 而这将是由恐惧驱动的。我建议, 要发生这种情况, 必须有一些类似洛斯阿拉莫斯那样的技术进步突发, 令公众感到恐惧。我想这就是我对你的非常具体的问题, 对吧, 你是, 你是一位人工智能投资者。你, 知道的, 你深度投资于Palantir, 军事技术, 监视技术, 战争技术等等, 而当你告诉我一个有关敌基督上台并利用技术变革的恐惧来在世界上施加秩序的故事时, 我觉得那个敌基督可能会使用你正在构建的工具, 像是, 敌基督不会很好, 知道吗, 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技术进步, 但我真的很喜欢Palantir到目前为止所做的,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难道这不是, 历史的讽刺就是那个公开担心敌基督的人不小心加速了他或她的到来吗?

彼得·蒂尔: 他们都在看, 听着, 有很多不同的情景。我显然不认为我在做这些。明确地说, 我不认为这是, 我也不认为你在做这些。

主持人: 我只是对你如何达到一个愿意服从于永久威权统治的世界感兴趣。

彼得·蒂尔: 好吧, 但, 再次强调, 我们可以描述这些不同的程度, 但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作为一个广泛的情况是如此荒谬吗? 整个世界在过去50年里屈服于和平与安全主义的停滞。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死敌基督的口号是和平与安全。我们屈服于, FDA不仅在美国监管药物, 实际上也在全世界进行监管, 因为其他国家都依赖FDA。核能监管委员会有效地监管着世界各地的核电厂。人们, 您不能, 你知道的, 不能设计一个模块化核反应堆然后直接在阿根廷建造。他们不会信任阿根廷的监管机构。他们将依赖美国。所以至少,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为什么经历了50年停滞的问题。一个答案是我们思想枯竭了。另一个答案是文化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使得这一切都是不被允许的。然后文化的答案可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回答, 认为这只是人类转变为一种更温顺的物种, 或者至少部分是自上而下的, 政府的机器发生了变化, 导致这种停滞的现象。我认为像核能这样的东西本应成为21世纪的力量, 而实际上它在全球范围内以某种方式被推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已经生活在反基督的温和统治之下, 在这种叙述中, 我们并不认为上帝掌控历史。我, 这再次像是, 我, 我认为人类的自由和选择总是存在空间, 这些事情, 或者至少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 这些事情, 您知道, 它们并不是, 您知道, 它们并不是绝对预定的, 无论是那种方式还是另一种方式。对。

主持人: 但是上帝不会让我们永远处于一个温和、适度、停滞不前的敌基督统治之下, 这不可能是故事的结局,

彼得·蒂尔: 归因于上帝过多的因果关系总是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不同的圣经经文, 但我会给你约翰福音15章25节, 基督说, 他们无缘无故地恨我。所以, 所有这些迫害基督的人都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来解释他们为何迫害基督。如果我们将这解读为一种最终的因果经文, 他们想说, 我迫害是因为上帝让我这么做。上帝在造成一切。基督教的观点是反加尔文主义的。上帝不在历史的背后。上帝不是在造成一切。如果你说上帝在造成一切。但等等, 上帝是…那是你的替罪羊上帝。

主持人: 你是在替上帝背锅。好吧，但上帝是推动耶稣基督进入历史的原因，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停留在停滞不前、颓废的罗马帝国，所以在某个时刻，在某个时刻，在某个时刻，上帝会介入。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那个加尔文主义者。但这并不是加尔文主义。这只是基督教。上帝不会让我们永远盯着屏幕，听格蕾塔·桑伯格的讲座，他不会把我们抛弃于那种命运。

彼得·蒂尔: 是的，是的，有很大的，我不知道，好的和坏的原因，我认为人类行动和人类自由的空间很大。如果，我认为这些事情是决定论的，你可以，也许就接受它吧。线条正在出现。你应该做一些瑜伽和祈祷冥想，等待那些线条吞噬你。而我认为这并不是你应该做的。

主持人: 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在这个点上，我只是，我只是想保持希望，并建议在试图利用你的自由意志抵抗敌基督时，你应该有希望成功，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好的。彼得·蒂尔，谢谢你加入我。

四十八岁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很急。因为，对他来说，人类的未来像是迅速消气的气球，他得赶快再用科技进步、自由乐观充饱它。

「为什么我们不敢再对未来抱有远大理想？」他向《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抱怨，「七〇年代的科幻小说是，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到月球散个步。现在的科幻小说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统治银河系，人们以捕猎星球、杀戮为乐。」

他相信，想像力的匮乏，是当今世界陷入困境的主因。或许，没有人像蒂尔，这么善于把互相矛盾的特质完美揉合。

他是PayPal共同创办人，硅谷最成功的创投家。

他投资过的新创公司，包括脸书、特斯拉、全球最大白领社交网站LinkedIn、全球最大串流音乐平台Spotify、全美第一家民营火箭公司SpaceX、全球最大线上租房平台Airbnb、美国最大线上评论网站Yelp、叫车服务Lyft，加起来市值超过三千亿美元，超过新加坡、香港GDP。

他是天使，投资新创

他一说话，全球创业圈，就有无数只耳朵竖起来听。

但科技也令他感到失望。他曾批评苹果只是在设计上创新，社交媒体不会把人类文明推向下一个阶段。他的「科技停滞论」阐述，自一九七三年后，在能源、医疗、交通、城市、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不足，让已开发国家步向衰疲。

「我们空有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变，却只有一点点进步，」他说。

他自小是数学天才，在高度竞争的教育体制一步步成长。十二岁时参加西洋棋比赛，拿过全美第七名。

但他却厌恶竞争。影响他思想最深的是法裔美籍人类学家吉哈（René Girard）的「模仿理论」，认为人类天生有模仿的欲望，而模仿衍生竞争，竞争也衍生模仿。模仿让语言可被学习、文化可以被传承，但模仿也让人流于盲从，丧失原创性与独立思考。

「像亚斯伯格症这种拙于社交的人，目前在硅谷占有优势，很可能是身上缺乏一些模仿基因，对身边的社会线索（social cues）没那么敏感，可以全心投入做与众不同的事，」蒂尔告诉《天下》。

他是游侠，挺休学创业

他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自青少年时期就坚信，自由是人类最高良善的前提条件。他喜欢铁娘子撒切尔说过的：「没有所谓社会，只有一个个的男人和一个个的女人。」

但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二〇〇四年给了当时二十岁、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五十万美元，换得脸书一〇.二%股权。他是脸书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这桩投资让他获利十亿美元现金。

「如果我完全相信撒切尔所说的，就不会投资脸书了。但我认同撒切尔的言外之意，社会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却很有力量，很容易扼杀创意，」蒂尔认真地说。

他是残酷教育擂台的胜利组。顶着斯坦福法学博士的光环，却成立「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休学创业，一年给二十位二十岁以下学生，一人十万美元，鼓励他们学习马克·吐温「我从不让学校干涉我的教育」的独立精神。

他读过十几遍托尔金的《魔戒》，最喜欢的角色是阿拉贡（Aragorn）。他也在教育世界扮演游侠，帮助身负使命的年轻人。

「美国高等教育沦为零和游戏。美国大学生一毕业就负债，输家变成最后一代契约奴隶，赢家也只是社会盲从者，」他严词批评，教育将是下一个泡沫，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不该把自己的未来「外包」给大机构。

他是逆势者，争议不断

他鼓励创业者逆势思考，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价值，从0到1，不要只是从1到N，在竞争中灭亡。

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孙子，共创「海洋家园协会」

（Seasteading Institute），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的海上城市计划。他的投资，都不断在网络空间、海洋空间、外太空，开辟自由的无限可能。

他是基督徒，却向死神宣战，投资延缓老化的再生疗法，追求永生。他投资的生物遗传学家格雷（Aubrey de Grey）在一封给《Fortune》的email中说，未来能活到一千岁的人可能已经诞生了。

天使、游侠、逆势者，蒂尔拒绝被定义，拒绝被分类。

问他，怎么让想像力奔驰？

他说，阅读，尤其是阅读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作者，和描写未来的老书（past book about future），像是舒莱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在一九六七年写的《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关于美国如何接管全世界的故事。

「现在看来，书中很多预测都是错误的，但单单是思考为何这些预测是错误的，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微笑答。

「世界的命运，可能就靠着一人不断建造、传播自由机制，让资本主义安全无伤，」蒂尔六年前写到。这样的使命感，让他快步向前。

以下是《天下杂志》独家专访，邀请你乘着他思想的翅膀，一起飞翔：

问：你认为竞争和资本主义是恰恰相反的两个概念，因为完全竞争会让利润消失，但资本主义是累积资本。马克思和莎士比亚带给你哪些启发？

答：冲突总是发生。

我相信莎士比亚是对的，马克思是错的

在马克思的版本中，人们是因为彼此不同才发生冲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在莎士比亚的版本，人们是因为彼此相似才导致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句台词是：两个同样尊贵的家族。蒙太古家族和卡普雷特家族是没有差异化的。

竞争最激烈的公司，是彼此最相似、都做同样事情的公司。如果你是一个要制造冲突的疯狂老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两个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因为相同，才导致竞争。如果能差异化，就能避免竞争。

问：但你自小高度竞争。你的西洋棋组上有一句箴言「天生赢家」（born to win）。但你现在却说，竞争只属于输家。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

答：当然，我成长于一个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中，下棋也是高度竞争的心智游戏。

我二十多岁时，在纽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工作，一群才华洋溢的聪明人，却可以完全彼此替代，每个人都在做其他人也在做的事，大家疯狂竞争、厌恶彼此。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竞争的价值，竞争并不会给你你想要的结果。

对创业者而言，一定要抵挡竞争的诱惑。如果你不确定你要做什么，只是模仿别人做过的事，你一点差异化都没有。你只有与众不同，创造独占事业，取得独占利润，才能成功。

当然，竞争会让你表现更好。如果你一直比赛下棋，你会愈来愈杰出。但到某个程度，竞争反而降低生产力，因为你太在乎身边的人、周遭的竞争，而忘了真正重要、创造价值的事。

问：竞争反而让人偏离原本的梦想，能否举例说明这反思带给你的成果？

答：在二〇〇〇年的一、二月，我创立的Confinity和马斯克（Elon Musk）创办的X.com竞争激烈。我们都在做支付产品，我们两家公司都在帕罗奥图市的大学路上，相距仅仅四条街，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蒙太古家族与卡普雷特家族。

竞争的确会让人全力迎战，我们许多工程师都一周工作超过一百小时。甚至有工程师真的为了消灭X.com设计了一个炸弹，我们归因于他极端缺乏睡眠（笑）。可怕的是，我们两家钱都快烧完了。我们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合并，创造一个市场领先者。（编按：两家公司合并时，只剩一千五百万美元，只能活六周。）

回头看，这是一个好决定。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募到了足够多的资金，熬过泡沫。（编按：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蒂尔与马斯克募集一亿美元，四天后，网络泡沫，纳斯达克股市狂泻。）

问：什么时候该力抗到底、赢得战争？什么时候该用并购、合作代替竞争、对抗？

答：大部分科技产业的并购都是微妙、难以捉摸的。当并购能带来综效、更大的价值，就值得考虑。比方说，二〇〇二年PayPal和eBay合并是很合理的，因为PayPal高达四分之三的生意都来自eBay。但现在，或许PayPal该考虑独立，因为只有四分之一生意来自eBay。

创业者最好一开始就想创立一个能自己持续成长的事业，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日后卖掉。当你只想卖公司，这就像昭告大众，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赶快把我买走吧！

当我们和eBay谈判时，总觉得eBay认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卖给他们。当PayPal在二〇〇二年二月上市，证明我们自己就能持续成长时，eBay才大幅增加并购金额，那年夏天PayPal就卖给eBay。

问：和追求逐步成长的「精实创业」相反，你鼓励创业家一开始就问，这事业十年后还在吗？你也认为，一家科技公司的价值多半要成立十到十五年后才会显现。为什么？

答：我们算过数学，二〇〇一年三月，PayPal还没开始赚钱，但我们试算未来现金流，〇二、〇三、〇四年我们会赚多少钱，我发现公司七五%的现值来自于二〇一一年以后的获利。企业今天的价值，是未来能赚到的现金流的总和。对脸书、LinkedIn而言，都是如此。

而且，伟大的科技公司，通常都不是拥有先发优势，而是有后发优势，在特定利基市场做出最后一个重大发展，享受数年或甚至数十年的独占利润。

微软是最后一个操作系统公司，Google是最后一个搜寻广告公司，脸书有价值是因为它成了最后一个社交网络公司。

问：先发优势、云端运算、大数据……，这些流行用语都是你投资新创公司时尽量避免的。还有哪些事会让你打枪新创公司？你曾说，你不投资穿西装打领带的科技公司主管，真正的科技家只穿牛仔裤和T恤？

答：穿着还是要看场合（笑）。不过呢，的确我对所有流行语都很感冒，像是「破坏」（disruption）。

帕克（Sean Parker）创办的在线音乐服务Napster，想要毁灭既存的音乐产业。这的确让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隔年，这公司倒闭。

破坏能赢得注意，却不会赢得成功

我不认为创立一家新公司来摧毁旧产业是明智的。创业家的目标应该是，解决一个独特的问题，打造一家成功、独特、持续成长的公司。

你想要创造的欲望，应该远多于你想要毁灭别人的欲望。

问：你认为当今世界陷入科技停滞。我们徒劳拥有许多眼花缭乱的变化，却只有一丁点进步。为什么？

答：我设立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有一句格言：我们想要在空中飞翔的车子，却只得到一百四十个字母（编按：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

改变不代表进步。我常常用价格这个指标来衡量进步。科技进步，是用更少做更多。

在电脑运算领域，我们有长足的进步。今天你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比一九六九年把阿波罗号射向月球的电脑还强大。可是在能源、医疗、交通、农业方面，我们没有进步。

石油的价格比起一九七三年还高。尼克松一九七四年想要在一九八〇年前实现能源自主的愿望，只换来奥巴马四年前的呼吁：二〇二五年前，三分之一石油不靠进口。「干净能源」只是「付不起的昂贵能源」的委婉说法。美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或许是一九七三年以来的薪资成长停滞。

很有可能，在能源产业的创新不足，刚好抵消了电脑产业的创新。我们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爱丽丝和红心皇后的那场赛跑，被迫跑得愈来愈快，却停留在原地。

我认为，如果在能源、医疗等其他领域都能有像电脑产业的科技创新，人们生活水准会提升、经济增长也会加速。

问：有人认为科技进步加剧了贫富不均，你怎么看？

答：我认为，全球化才是贫富不均的元凶，科技只是全球化的代罪羔羊。

如果说，一个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工人失业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电脑产业还没有大到可以吸收这些失业工人。或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创新，让这些失业工人重新找到工作。

真正的困境，来自成长停滞

由于成长停滞，经济与政治往往变成零合游戏，我必须从你这里夺走，我才有成长。这是为什么已开发国家的政治都变得毒辣刻薄。

一个成长停滞的世界，就像中古世纪的封建社会，只有你继承的遗产才重要，因为要创造新财富极端困难。但在一个充满动能的世界，过去累积的财富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永远有机会创造新的财富。

问：但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封建、不平等。《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提提议，要对像你这样的富人征收高达七〇%到八〇%的资本利得税。你怎么看？

答：法国七五%的税已经取消了，这行不通。高税率反而让成长更停滞，让困境变本加厉。

问：你相信科技进步，更甚于相信政府与政治？

答：我把希望寄托在寻找重新启动成长的方法。

问：你也投资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例如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的海上城市计划。你也投资尝试延长人类寿命的医学研究。为什么你要向死神宣战？

答：我认为，有很多领域我们都还没认真探索。当你三十岁时，你明年罹患癌症的机率是千分之一。当你八十岁时，这机率就是十分之一。这世界需要探问：什么导致老化？做了哪些事可以延缓、甚至逆转老化？

大部分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有点精神分裂的，很悲观地接受，认为没有什么将阻止死亡，不需要任何改变；也很乐观地否定，认为我不会那么快面临死亡，没有必要去思索。我想，在消极的接受与积极的否定之外，我们应该花多一点时间更认真与死亡奋战。

死亡是一种疾病，我们要治愈它。

以下是访谈内容，由Web3天空之城整理。

Joe：怎么了，伙计？很高兴见到你。

Peter：也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感谢你的邀请，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Joe: 我们刚才在谈论你还被困在洛杉矶的事情。

Peter: 是的，我还被困在洛杉矶。我知道，这确实是个问题。

Joe: 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吗？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

Peter: 我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总是说得多，行动得少。说话往往代替了行动。

Joe: 你觉得这会导致行动，还是最终只是空谈？

Peter:

这是个好问题。我无休止地谈论离开洛杉矶。2018年，我从旧金山搬到了洛杉矶，当时感觉这是一次尽可能大的搬家。我一直在说一些极端的话，但最终还是用言语代替了行动。我一直在说的极端一点是，我无法决定是离开这个州还是离开这个国家。

Joe: 哦，天哪。如果你真的要出国，你会去哪里？

Peter: 伙计，这确实很难决定。因为美国有很多问题，但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更糟。

我一直在想，我不应该搬家两次。所以我在犹豫，是搬到佛罗里达，还是搬到新西兰，或者哥斯达黎加，或者类似的地方。是的，完全像约翰·迈克菲那样的生活方式。但我无法在这些选择之间作出决定，所以最终我还是被困在了加利福尼亚。

Joe:

澳大利亚还不错，但在法治方面，他们甚至更糟糕。他们决定你该做什么，并且现在还在打击人们的网络言论。而在其他国家，情况也非常可疑。

Peter:

尽管如此，美国的表现相对来说还算不错。

美国的绝对停滞和衰退实际上是相关的，因为每次我告诉别人我在考虑离开这个国家时，他们都会说，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更糟。这种说法不知不觉中分散了我们对美国问题的注意力。我们无法深入讨论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总有人说其他地方更糟。

Joe:

我认为大多数人都知道问题所在，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在现任政府的一边。他们不知道如何批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某个群体的正确性有关联，所以他们试图通过脑力体操来支持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而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也不了解这些问题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Peter:

是的，有许多问题在表达和描述时看似简单，但在实际解决时却非常困难。比如，我们目前面临一个严重的预算赤字问题。

是的，面对这个问题，你大概有三种选择：大幅提高税收、大幅削减开支，或者继续借钱。

我们的税收收入中确实存在大量赤字。虽然税收增长了很多，但仍然不足以弥补赤字。

Joe:

具体来说，税收增长了多少？

Peter:

我记得大约是34%左右。我想说，税收收入在某个时点达到了GDP的3.1%，这大概占预算的15%到20%。

在1991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3.1%的峰值，随后在2010年代中期一路下滑至1.5%左右，而现在又回升至3.1%或3.2%。因此，从GDP占比来看，这一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

理解这一现象的基本数学逻辑是，尽管债务大幅增加，但利率却下降了。从2008年到2021年的13年间，我们基本上处于零利率状态。虽然在鲍威尔执政期间曾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波动，但总体上利率接近于零。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借更多的钱，而不必担心偿还债务，因为你只需支付接近零利率的国库券利息。然而，当前的财政状况非常危险，因为利率已经回升至正值，就像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2000年代中期那样，而债务规模却非常庞大。因此，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真正的赤字失控问题。

Joe:

然而，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40年，40年来人们一直在警告赤字问题，但由于“狼来了”的效应，人们很难再认真对待它。大多数人甚至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你说有赤字，我们欠钱。那么，欠谁的钱？这怎么算？

Peter:

实际上，我们欠的是那些购买债券的人，其中很多是美国人自己。一部分债务由美联储持有，而目前相当一部分债务由外国人持有。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贸易经常账户赤字相对应。美国一直存在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外国人最终获得的美元远远超过他们想花在美国商品或服务上的金额，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这些美元重新投资到美国。有些人把钱投入房产或股票，但很多钱都投入了政府债务。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贸易失衡、长期贸易赤字的结果。

Joe:

那么，如果你拥有最高权力，如果彼得·泰尔是世界统治者，你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Peter:

老实说，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荒谬的假设。荒谬的假设只能得到荒谬的答案。

Joe:

但我想要一个荒谬的答案，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么，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缓解这个问题，又能做些什么来真正解决它呢？

Peter:

我认为我的观点可能非常自由主义，因此我主张通过缩小政府规模、提高社会保障领取年龄以及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来逐步减少政府福利。这样一来，社会保障就不会惠及每个人，而是只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然而，这种做法非常不受欢迎，从现实层面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会让那些依赖社会保障的人感到困扰。

我提到的经济状况调查，旨在确保那些不需要社会保障的人无法获得它。即使你非常富有，你仍然可以领取社会保障，因为它最初被设计为一种养老金制度，而不是福利制度。我们虚构了一个概念，即你缴纳了社会保障税，就有权以养老金的形式领取社会保障。这种虚构的设定使得每个人都能获得社会保障，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养老金制度，而不是跨代庞氏骗局或类似的东西。

如果我们更诚实地承认社会保障只是一个福利制度，那么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合理化它。社会保障的运作部分与个人的缴纳金额相关，但并不完全如此。你得到的保障有一个最低限度，如果你缴纳更多，你得到的也会更多，但这也有一个上限。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保障税的上限大约是每年15万美元。

目前，有一个重要的增税提案，即取消这个上限，这将意味着对所有收入征收12.4%的所得税。进步左翼民主党人认为，为什么要征收倒退的社会保障税？为什么你要缴纳12.4%或其他比例的社会保障税？其中一半由你支付，另一半由你的雇主支付，但上限是14万到15万美元左右。如果你每年赚50万美元或100万美元，你对边际收入不缴纳任何税，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如果社会保障是一个福利计划，那么这种税收方式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它是一个退休储蓄计划，那么你的支出有上限，你不需要投入超过你得到的。

Joe:

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如今人们谈论税收的方式并没有太多逻辑性。比如，加州刚刚把他们的税收提高到14.3%或14.4%左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你想要更多的钱来做一份糟糕的工作，并且让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州，这是加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

Peter:

是的，但你看，加州侥幸逃脱了惩罚。我知道，所以人们别无选择。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选择离开，但州政府的收入却在不断增加。即使有5%的人口流失，政府仍然能够从剩下的90%的人口获得更多的收入。加州的税收体系缺乏弹性，因此它实际上能够增加收入。

这就是加州的疯狂之处。总有右翼或自由主义者批评加州，认为它是一个荒谬的地方，应该因为自身的荒谬而崩溃。但事实并非如此。加州的宏观经济状况相当不错。它拥有4000万人口，GDP约为4万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德国的8000万人口或日本的1.25亿人口的GDP。日本的人口是加州的三倍，但两者的GDP相同，这意味着加州的人均GDP是日本的三倍。因此，尽管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加州似乎行不通，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在运作。

然而，对于许多住在加州的人来说，这个州并不理想。我对加州的粗略看法是，它有点像沙特阿拉伯。加州有一种疯狂的“宗教”——沃克主义，而沙特阿拉伯有瓦哈比主义。虽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些“宗教”，但它们却扭曲了一切。沙特阿拉伯有油田，而加州有大型科技公司。石油支付了一切费用，因此政府部门变得臃肿、效率低下。加州的房地产市场也存在各种扭曲，许多人从中获利。政府和房地产成为了重新分配加州“石油财富”或大型科技公司资金的方式。

这似乎不是你想从头开始设计的系统，但它相当稳定。人们一直在说沙特阿拉伯太荒谬，随时都会崩溃。他们已经这么说了四五十年了。但如果你有一个巨型油田，你可以为很多荒谬的事情买单。我认为，这就是你必须看待加州的方式。

加州确实有些事情很荒谬，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自然毁灭。

Joe:

那里有很多聪明的人，也有很多人仍然在创造巨额财富。离开加州并不容易。

Peter:

我认为，全球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八九家公司中，有四家位于加州。这是非常惊人的，包括谷歌、苹果、英伟达和Meta。我认为博通也差不多。

Joe: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理想的居住地，加州并不是那么糟糕。

因此，加州是一个可以完全融入其中的地方，拥有巨大的GDP和庞大的人口。没有一个大城市能够完全取代它。

Peter:

有些事情在加州是可行的。我研究了美国所有的零税州，发现你不住在州里——理论上，很多事情发生在州一级，但你不住在州里。你住在城市里，因此，如果你倾向于居住在至少是中等规模的城市，我可以告诉你，有四个州没有城市：阿拉斯加州、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这些州虽然没有州税，但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城市。

接下来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那里的天气是全国最差的。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我个人不太喜欢那里。然后剩下三个没有州税的州：德克萨斯州、田纳西州和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是我喜欢的一个州，但我不太喜欢奥斯汀、达拉斯或休斯顿。休斯顿有点像石油城，如果你从事石油行业，那很好，但除此之外就不太理想。达拉斯有点自卑，总是与洛杉矶和纽约比较，这种态度并不健康。至于奥斯汀，它是一个政府城、大学城和旧金山的时尚城的结合体，所以对我来说，这三个城市都不太合适。

剩下的选择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南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两个城市是我的首选。迈阿密很有趣，但我不想住在那里。

Joe:

虽然它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但有点太疯狂、太混乱、太多可卡因和派对了。

Peter:

迈阿密的旅游区与其他地方相对隔离，任何吸引大量游客的地方可能都会有些矛盾。虽然游客带来了活力，但也创造了一种奇怪的氛围，因为每天的感觉就像是在玩乐而不是工作。

相比之下，纳什维尔是一个真正的地方，那里很棒。所以，这两个城市是我的前两个选择。我可以住在纳什维尔，没问题。

我从1977年起就一直住在加州，从五年级开始我就一直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我认为除了加州海岸，美国没有哪个地方全年都有好天气。也许夏威夷的天气也不错，但加州海岸的气候真的很难被超越。而且你离山脉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是八月中旬，奥斯汀的天气简直太残酷了。对我来说，这太热了。今天的温度是多少？96度？这证明了我的观点。

Joe:我可能因为经常洗桑拿，所以根本没注意到。我每天都在外面射箭好几个小时，甚至没有注意到温度的变化。

Peter: 不过，我不确定你是否代表了奥斯汀的普通居民。

Joe:

我认为你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对我来说，这比太冷要好得多。寒冷可能致命。我知道你可能会因为高温而死亡，但如果有水的话，你可能不会有事。然而，寒冷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在极寒的地方，一年中有五个月你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比如，如果你住在怀俄明州，在某个地方抛锚了，而路上没有人经过，你可能会因此丧命。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你可能会因为暴露在寒冷中而死亡。

Peter:

过去五十年里，美国西部和南部的人口净迁移可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加利福尼亚，你几乎不会犯错。

Joe:

只要地震不发生，海啸不来袭，你就会很好。这里几乎全年都是一个完美的环境。夏天虽然有点热，但沿海地区却非常凉爽。在马里布，80华氏度的天气并不常见，天气非常宜人，海风轻拂，阳光明媚，每个人都显得格外美丽。

Peter:

然而，这一切与高额的税收有关。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愿意离开。

Joe:

我也不想离开加利福尼亚，这里实在太棒了。我很感激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我总是幻想，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离开，就会给政府带来压力，但事实是，这永远不够，也永远不会足够。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开加利福尼亚太难了。对我来说，这也非常困难，尽管我有一群愿意为我工作并收拾行李离开的人，比如那边的年轻杰米。

Peter:

搬迁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的业务是与人交谈时，这就是我业务的一部分。我的另一项业务是单口喜剧。

在COVID期间，你离开了吗？

Joe:

是的，我一开始就离开了。当他们一开始封锁时，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永远不会让我们自由。2020年3月、4月、5月，我开始看房子。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奥斯汀。

Peter:

2020年9月，我在迈阿密找到了一个住处，过去四个冬天我都在那里度过，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搬到佛罗里达。离开加利福尼亚很难，但与四年前相比，现在搬家变得更加困难。总体来说，这些年来我的房地产投资表现一般，虽然还算不错，但肯定不是我赚钱的主要方式。不过，迈阿密的房产是个例外。我在2020年9月买的房子，四年后，它的价值上涨了100%。

然而，矛盾的是，这也意味着搬到迈阿密或奥斯汀等地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我把办公室搬到洛杉矶，有房子的人就必须在佛罗里达买一套房子，而现在的成本是四年前的两倍，利率也翻了一番。你获得了一份30年期的抵押贷款，2020年时你可以锁定3%的利率。而现在，利率可能已经上升到6.5%或7%。因此，房价翻了一番，抵押贷款也翻了一番，买房的成本是原来的四倍。

在COVID期间，人们确实可以搬家，但与四年前相比，现在搬家变得更加困难。

Joe:

奥斯汀的房地产市场曾经非常火爆，随后又有所回落。我们目前处于一个略微低迷的阶段，尽管仍有许多高端房产在出售，但这些房产的主人无法轻易搬家。这与之前的情况不同，现在没有那么多人像繁荣时期那样搬到这里，因为其他地方也都开放了。

Peter:

我认为奥斯汀和加利福尼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而迈阿密和纽约之间的联系则更为紧密。奥斯汀的迁移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州的科技界人士搬迁至此。迈阿密-南佛罗里达的迁移潮则部分源于纽约市金融界人士的南迁。然而，金融业在纽约市的网络化程度较低，因此如果你经营私募股权基金或在银行工作，将其中一些职能转移到其他州是相对容易的。

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的科技行业高度网络化，尽管可能存在某种方式可以实现迁移，但这并不容易。

Joe:

加利福尼亚州有大量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规模庞大，生活和工作在加州并参与科技行业的人数众多。

Peter:

如果科技行业没有如此紧密的网络化，或许人们会更愿意搬家。然而，这些网络化的联系可能会持续，直到某一天它们不再存在。

底特律的汽车行业曾经也是高度网络化的。几十年来，底特律的汽车行业一直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密歇根州的管理逐渐恶化，人们曾以为这种网络化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都在底特律。然而，随着所有的供应链也集中在底特律，最终这种网络化变得不再可持续。人们开始搬迁，工厂也逐渐迁出该地区，最终导致了底特律的崩溃。

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

Joe:

如果所有的科技公司都离开加州，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动。看看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情况，当时所有的汽车厂都撤离了，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Peter:

互联网的一个悖论在于，尽管互联网的初衷是消除地方的限制，但互联网公司却高度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可能存在不同的网络化和非网络化浪潮。2021年，随着COVID逐渐远离加利福尼亚，科技界的一个大事件是加密货币的兴起。加密货币有一种远离中央银行的替代货币的自负观念，但加密货币公司和加密协议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你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进行，也可以在迈阿密进行。因此，加密货币是技术领域中可以自然地加利福尼亚转移出去的一个例子。而今天，核心技术的叙事可能已经完全转向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一些特性，使其非常集中化。几年前，我曾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认为加密货币代表自由主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人工智能代表某种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人工智能公司的自然结构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大公司。不知何故，人工智能似乎将由旧金山湾区的大型科技公司主导。如果这就是科技的未来，那么该行业的规模和自然发展趋势表明，离开旧金山湾区将变得极其困难。

Joe:

当你展望未来，并试图猜测人工智能将如何发展时，我们在未来五年会看到什么？

Peter:

对此，我想我应该谦虚地回答，**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点几乎所有专家都同意。

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我的看法。我一直以来都无法忍受任何流行语。关于人工智能，有太多诸如“大数据”、“云计算”之类的流行语。人们总是用这些流行语来抽象化事物，以某种方式逃避现实。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理想。

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概念，因为它可以意味着下一代计算机，也可以意味着最后一代计算机，甚至可以意味着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东西。如果你回顾2010年代的人工智能讨论，尤其是在OpenAI和ChatGPT以及过去两年的革命之前，2010年代的人工智能讨论可能基于对人工智能的两种看法。

其中一种看法来自牛津大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他在2014年写了《超级智能》一书，基本上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超级智能，像神一样的智能，比任何人类都要聪明。李开复在2018年出版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一书。我认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应该是“硅谷和中国之间的人工智能竞赛”之类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相对低技术的东西，比如监控和面部识别技术。书中暗示，这种技术不需要太多创新，只需要应用一些现有的技术。基本上，潜台词是中国会赢，因为在中国，我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不会犹豫将这种基本的机器学习应用于人口的测量或控制。

这两种观点可以说是2010年代人工智能辩论的支柱，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竞争愿景。而在2022年末至2023年初，随着ChatGPT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你没有获得超级智能，也不仅仅是监控技术，而是达到了1950年至2010年间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定义。人们一直在讨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的定义通常是通过图灵测试来衡量的。图灵测试的基本含义是，计算机能够欺骗你，让你误以为它是人类。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测试，因为显然你可以让计算机专家或非专家来进行测试，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问题在于，计算机是一直能够欺骗你，还是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欺骗你？它的表现到底有多好？尽管如此，初步估计表明，到2021年，我们甚至还没有接近通过图灵测试。

然而，ChatGPT基本上通过了图灵测试，至少对于智商100的普通人来说是这样。它通过了图灵测试，这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研究过去60年的圣杯。因此，我不禁思考，可能存在某种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历史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似乎对这一成就反应平淡。博斯特罗姆关于超级智能的讨论和李开复关于监控技术的辩论，几乎让人感觉到人们受到了某种心理压抑，他们不再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忘记了图灵测试和圣杯的存在，因为它们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一件如此重要、意义重大的事情，以至于人们甚至不敢去想它。

因此，我很想对2010年的辩论提出一种心理压抑理论。但无论如何，图灵测试已经通过了。这确实是一项非凡的成就。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可能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改进这些技术，但要将其广泛应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关于AGI（通用人工智能）的讨论也引发了很多思考。我们已经拥有了人工智能，但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的“通用智力”可能只是一个一般聪明的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只是一个智商为130的人？还是说它是超级智能，甚至是神一般的智慧？这个问题有些模棱两可。

然而，我一直在思考，**也许AGI的问题并不如通过图灵测试重要**。如果我们拥有了AGI，或者超级智能，这对“上帝”来说可能会很有趣，因为这意味着你将面临成为上帝的竞争。但图灵测试对我们人类来说肯定更为重要，因为它要么是人类的补充，要么是人类的替代。因此，这将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重新安排我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我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未来将要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当然，要将这些技术广泛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想用一个比喻来总结这些思考。历史的类比永远不会完美，但也许2023年、2024年的人工智能就像1999年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显而易见的是，互联网将变得庞大，并且会变得更大。它将主宰经济，并在21世纪重新安排社会结构。然而，当时互联网也完全是一个泡沫，人们并不知道商业模式将如何运作。几乎所有的泡沫都破灭了。从长远来看，这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互联网用了15到20年的时间才成为超级主导力量。尽管人们在1999年曾幻想某些技术会在18个月内实现，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许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探索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实际应用，但这可能需要大约二十年的时间。然而，这并没有削弱人们对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重大技术进步的关心。我认为你对图灵测试的看法是正确的。

Joe:

你提到，缺乏公众的认可或庆祝，甚至缺少主流讨论，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你认为这与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事实有关吗？

Peter:

即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仍然知道GPT-5会更好，GPT-6将会更加惊人。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致力于这些技术的开发。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几乎不愿意承认我们所处的现状。

我经常思考，过去大约15年来，科学或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硅谷所声称的那么大。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真的会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吗？互联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它究竟提高了多少人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

在这个技术相对停滞的时代，当某件大事发生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是一个悖论。因此，我认为比特币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无论它的影响是好是坏，但它确实是一件大事。至少在最初的10到11年里，它被系统性地低估了。你可以交易它，它在这段时间内平稳上涨。它没有一下子重新定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事很少发生的世界里，所以当真正的大事发生时，我们无法正确处理它。

互联网在1999年非常流行，比特币也相当流行。我想说，通过图灵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影响力与互联网处于同一规模。然而，由于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感觉变化不大，我们可能低估了它的意义。

Joe:

有趣的是，你提到我们感觉变化很小。如果你是一个出生于1967年的人，那么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见证了许多变化：冷战的结束、答录机的出现、VHS录像带的普及，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奇怪的时刻，人们每天都把互联网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这些超级复杂的计算机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有一台。每年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在发展，它们一直在进步。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你的手机上也有人工智能，你可以在手机上访问ChatGPT和一堆不同的程序。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剧烈的变化，可能是我们文化史上最奇特的转变之一，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

Peter:

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然而，我想探讨的是，从经济角度如何衡量这一变化？它对GDP的影响有多大？对生产力的影响又有多大？

通常，我会回顾过去50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并非处于绝对停滞状态，但确实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时代，尤其是在原子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发展方面。相比之下，比特、信息、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现在还有人工智能的崛起。

Joe:

你提到的“物质世界”具体指什么？

Peter:

如果我们在1967年，也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年，讨论技术的含义，技术会包括电脑、火箭、超音速飞机、新药物、农业的绿色革命，甚至可能包括水下城市。那时，技术被简单地定义为正在变化和进步的事物。因此，所有这些领域都曾取得过进展。

然而，今天，当我们谈论技术时，通常只是在谈论信息技术。技术的概念已经被简化为计算机，这反映出进步的结构变得非常奇怪。在比特世界和计算机领域，进步非常迅速且集中，而其他所有领域则相对停滞不前。我们的速度并没有加快。协和式飞机在2003年退役，而由于机场安检技术含量低，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的时间反而变得更长。高速公路的状况也在倒退，因为交通堵塞越来越严重，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与四五十年前相比，我们的进步确实有所放缓。

此外，屏幕和设备也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当你在纽约乘坐百年历史的地铁时，手里拿着iPhone，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新玩意儿，但你也会有这样一个事实分散注意力：你的生活环境在过去100年里几乎没有改变。因此，问题在于，比特世界与原子世界相比究竟有多重要。作为人类，我们的身体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因此我始终认为原子世界非常重要。当它相对停滞不前时，很多事情就失去了意义。

我在80年代末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回想起来，当时每个工程领域都不再是值得进入的领域。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等所有这些工程领域都在修修补补，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最终这些领域都陷入了停滞。这些领域受到严格监管，你无法在其中提出新的创新。核工程和航空航天工程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领域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非法的。在核反应堆设计或类似领域，你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比之下，电气工程，尤其是与半导体制造相关的领域，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然而，唯一真正取得显著进展的领域是计算机科学。尽管如此，这种进展并不像1980年代那样令人振奋。在那个年代，计算机科学被视为一个荒谬且低劣的学科。我一直认为，当人们使用“科学”这个词时，应该是指真正的科学。我不赞成用引号来引发关于科学的争论，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它不是真正的科学。因此，当我们谈论“气候科学”、“政治科学”或“社会科学”时，这些领域实际上是在编造一些东西，表现出对真正的科学，如物理学或化学的自卑感。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属于同一类别，是那些认为电气工程或数学太难而退出真正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人所选择的虚假领域。

Joe: 你是否认为气候科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Peter:

气候变化可能确实在发生，但我们可能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我并不质疑气候变化的存在，但对于其科学性，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真正激烈辩论的领域。也许气候变暖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气温确实在上升，但也可能是甲烷的作用，或者是因为人们吃了太多牛排，导致奶牛放屁。你必须严格测量甲烷与二氧化碳相比的温室气体含量，但我不认为他们在科学上严格地做了这些事情。事实上，气候科学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它比任何真正的科学都更具教条性。

Joe:

教条并不意味着它是错误的，但为什么气候科学这个名称意味着它更具教条性呢？因为如果说“核科学”，你不会质疑它的科学性。

Peter:

是的，但实际上没有人称它为“核科学”，而是称之为“核工程”。这很有趣，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提出一个狭隘的语言观点：是否有任何被称为“科学”的东西是真正的科学？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说计算机科学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与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属于同一类别。这表明，参与这些领域的人内心深处知道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Joe:

气候科学中肯定存在某种意识形态，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投资于绿色能源的前景和概念，并从中获利。他们推动各种不同的政策，无论是电动汽车的规定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在加州，我认为是2035年，他们规定所有新车都必须是电动汽车，但当你连接到一个无法支持目前电动汽车需求的电网时，这显得非常可笑。在他们发表这些言论后的一两个月内，加文·纽瑟姆就要求人们不要给他们的特斯拉充电，因为当时正值夏季，电网出现了问题。

Peter:

这一切都与各种意识形态项目密切相关。

其中一个项目是环境保护，但这个项目或许不应该完全依赖科学。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如果我们必须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而你又能证明地球正在过热，那可能已经为时过晚。因此，如果你是一个铁杆环保主义者，你可能不希望设立过高的科学标准。

我的直觉是，当你远离科学的严谨性时，最终可能会走向过于教条、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即使地球确实在变暖，这种方法也可能行不通。也许气候科学本身存在问题，比如甲烷是否比二氧化碳更危险？我们甚至无法准确测量它。

Joe:

此外，我们还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可以封存碳的再生农场。而比尔·盖茨等人却认为，通过植树来处理碳是荒谬的。这种观点令人费解，因为树木实际上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这是它们的食物，也是植物生命的力量所在。我们与植物建立了共生关系，二氧化碳越多，地球就越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地球比过去100年都要绿。

然而，这些事实对于那些在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上持有狭隘观点的人来说，显得非常不方便。

Peter:

尽管如此，或许也有办法让另一方变得更为坚强。回顾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宣言：我们需要走向一个零增长的社会，因为无限的增长会耗尽资源。如果资源不被耗尽，污染问题也会成为限制因素。

在1970年代，人们担心人口过剩和石油枯竭，经历了石油危机。到了1990年代，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更多的污染问题，包括二氧化碳、气候变化等。然而，碳燃料在水力压裂技术的推动下有所改善，比如德克萨斯州的情况，但这还不足以让全球的生活水平达到美国的标准。

目前，我们每天在全球消耗1亿桶石油。即使水力压裂技术能够增加10%的产量，也不过是1000万桶。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美国的生活水平，那么石油消费量可能会达到3亿到4亿桶，但我认为地球上并没有那么多石油储量。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这是否是真正的环境论点。我们无法让整个地球的生活水平达到美国的标准，也无法证明这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并通过征税来限制碳

排放。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被视为某种“马尔萨斯式”的计算方式，它更多地关注资源的使用，而非污染的控制。

Joe:

核能在缓解石油需求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

Peter:

可能会有显著的效果。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核能会变得如此不受欢迎，尤其是在电动汽车普及的情况下。内燃机可能难以与核能协同工作，但如果我们转向电动汽车，夜间为特斯拉等电动车充电似乎是可行的。

能源的历史无疑是朝着更高密度、更紧凑的方向发展的。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能源形式变得越来越紧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它们对环境的占用更少。如果我们从石油转向铀，能源的体积将进一步缩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能量密度越大，对环境的占用就越少。

然而，当我们从石油转向天然气时，能源的占用空间增加了；而从天然气转向太阳能或风能时，我们不得不通过安装大量风车或覆盖大片沙漠的太阳能电池板来满足需求。这种方式虽然可行，但也意味着对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因此，核能可以被视为一种更为集中的能源形式，尽管它也带来了污染问题。

核能曾被认为是21世纪的能源模式，但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这一预期。为什么核能的发展停滞了？标准解释是，核能存在诸多危险。1979年的三哩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都是核能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

然而，我认为核能停滞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反乌托邦甚至世界末日的潜在威胁。核能具有双重用途，如果一个国家建造了核电站，那么距离制造核武器仅有一步之遥。事实证明，将核能与核武器区分开来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1974年或1975年，印度成功制造了核弹，这一事件标志着核能的地缘政治问题开始显现。美国曾将核反应堆技术转让给印度，原以为印度无法将其武器化，但事实证明，武器化相对容易。

因此，核电的地缘政治问题变得复杂。美国拥有核电，但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核电，因为这可能导致核武器的扩散。这种双重标准难以令人信服，除非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来监管核能的使

用，但这听起来也不太现实。最终的妥协是对核能进行严格监管，虽然核电站可以继续运行，但建造新核电站的成本变得过高。

即使是中国，这个建造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建造的核电站数量也远低于十年前的预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设计缺乏信任，不得不复制西方的过度安全和过度保护的设计。这使得核电的成本变得过于高昂。使用煤炭的成本更低。因此，中国在电力生产中对核能的依赖并不高。虽然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如果你查看中国电力中核能的占比，会发现这个比例并不大。2013年和2014年，核能在中国电力中的占比大约是4%到5%。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比例并没有显著上升，尽管中国的用电量可能翻了一番，核能的使用量也可能翻了一番，但相对比例仍然很小。这是因为当你使用那些过度安全设计的反应堆时，成本会更高。

或许有一些方法可以建造更便宜的小型反应堆，但你仍然需要考虑双重用途的问题。比如，你们会制造钚吗？你们有办法制造更多核武器吗？

Joe:

如果核工程能够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没有发生三哩岛或切尔诺贝利事故，你认为现在的核工程会发展到更高效、更有效的版本吗？

Peter:

我的理解是，我们确实有更高效的设计。我们有小型反应堆的设计，这些设计不需要巨大的遏制结构，因此每千瓦时电力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设计，只是它们没有被允许使用。

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在世界各地建造这些反应堆，双重用途的问题仍然存在。再说一次，我认为核电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三哩岛或切尔诺贝利事故，而是印度获得了核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Joe: 这完全说得通。

Peter: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技术发展会放缓，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停滞。我通常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成为了一个更加女性化、更加规避风险的社会，可能是教育系

统运作得不太好，或者我们只是没有新的想法了。简单的想法已经被找到了，而困难的想法，大自然的“橱柜”已经空了，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走了。

然而，我认为科学技术停滞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很多科学技术都具有反乌托邦或世界末日的性质。1945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发生的事情，以及50年代早期的热核武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但它们有一种延迟效应，也许在一个停滞的世界里，物理学家们无所事事，只能在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上闲逛，但至少他们不会再制造能够毁灭世界的武器了。

所以，技术停滞可能是一种反应。我们已经在这个停滞的世界里生活了50年，很多东西都停滞不前，这确实令人遗憾。但如果我们的世界仍然在各个方面加速发展，拥有超音速、高超音速飞机、高超音速武器和模块化核反应堆，也许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整个世界早就爆炸了。我们目前处在多元宇宙的停滞路径中，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保护作用，尽管在其他方面，它深深扰乱了我们的社会。

Joe: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合理的观点，尤其是在核能的双重用途方面，特别是当核能被分发到其他国家时。

当你提到这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时，我不确定你对整个UAP（不明空中现象）事件了解多少。我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你提到过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Peter:

哦，对了，是拍《诸神战车》的那个人，Erich von Däniken。

你当时提到你不太认同他的观点，虽然你喜欢Graham Hancock的理论，但对Däniken的看法却不太一样。

Joe:

其实，我并不认为Däniken的观点完全疯狂。在我看来，他只是有意忽略了一些已经被解决的证据。他的假设主要围绕着一个概念，即我们曾经被外星文明访问过，这些外星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并用这些技术建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建筑。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执着于这些观点。

Peter:

相比之下，我认为一个更令人信服的想法是，大约在1万年前，地球上可能存在着非常先进的文化。这些文化无论是在何时建造了那些令人惊叹的建筑，他们都是当时的地球人类。我相信他们掌握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后来失传了。技术的丢失可能是由于大灾变、疾病、饥荒，或者是各种战争和其他原因，比如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技术可以以各种方式永远消失。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生活在洛杉矶，享受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社会，而亚马逊地区的人们仍然过着他们千百年来生活方式。这表明这些事情可以同时发生在同一个星球上。我认为，当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发展较为缓慢时，古埃及人却做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也许是从外来访客那里得到的，也许是他们自己发现的，但目前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们得到了外星文明的帮助。

相反，我认为有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新仙女木撞击理论，它完全基于科学研究，基于核心样本和铍含量的分析，以及环境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北美冰盖的融化。我们知道大约在1.1万年前，甚至可能在1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世界各地的撞击坑就是证据。

在这个星球上，事情出问题和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是常有的事。比如，公元前12世纪中叶，青铜时代文明崩溃了。我们所拥有的最精彩的历史之一可能是罗马帝国的衰落，这显然是古典世界的顶峰，但它的衰落过程却极其混乱。我认为我的观点可能介于你和另一位学者之间，但不是冯·丹尼肯。我更倾向于另一种看法。让我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如此重要。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古物研究的兴趣。

今天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另一种选择——如果我们承认文明经历了伟大的兴衰，经历了这些巨大的周期。也许青铜时代的文明非常先进，但有人发明了铁制武器，这在一个维度上取得了进步，但却可能摧毁了其他所有维度。罗马帝国的衰落也是一个相当灾难性的事件，疾病肆虐，政治问题随之瓦解。不知何故，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400到600年间进入了黑暗时代。

那些天真的、进步的观点认为，事情总是单调地变得更好。还有一种修正主义的、纯粹进步的历史观，甚至认为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衰落。甚至有一种愚蠢的量化方法，试图通过纯粹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衡量这些事物。问题是，过去有多少人生活在那个时代？文明的兴衰故事表明，罗马帝国时期有更多的人口，因为它更先进，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然后，人口数量下降。罗马城在鼎盛时期可能有100万人口，但到了公元650年左右，人数可能降到了1万甚至更少，人口完全崩溃了。

另一种纯粹进步的观点认为，人口一直在单调地增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衡量总体情况是否一直在变好的指标。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人口经历了巨大的起伏，文明也经历了巨大的兴衰。在这方面，我同意你的看法，甚至同意汉考克或范达纳所提出的一些不同观点。

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我们的文明似乎有可能出问题。这总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如果文明一直在单调地进步，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什么都不会出错。然而，汉考克、范达尼坎、乔·罗根以及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文明视为理所当然。有些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我同意这一点。

我唯一不同的看法是，我确实认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在某些方面比过去的任何文明都要先进得多。我不认为过去的任何文明拥有核武器，也不认为他们拥有宇宙飞船或类似的技术。因此，今天的失败模式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

Joe:

是的，这很有道理。我认为技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结构技术、建筑技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今天无法达到的水平。比如，当你看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时，它由230万块石头组成，整个金字塔精确地指向正北、正南、正东和正西。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其中一些石头是从500英里外的采石场穿过山脉搬运过来的。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巨大的石头，国王墓室里的石头，最大的有80吨重。这一切都显得极为疯狂。比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据说，他们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些壮举。他们没有使用内燃机，也没有电力，然而他们却能够建造出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不仅仅是让人们看看而已。

就像你可以去雅典卫城看看帕台农神庙，它很美，很神奇，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能理解人们是如何建造它的。然而，金字塔却是那种你只要看一眼就会感到困惑的建筑。你会不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人早已不在，而现在的文化完全建立在开罗和大量游客的基础上。人们只是盯着这些古代遗迹看，试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人都先进得多。

Peter: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将重点放在技术部分，但我认为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他们文化上的动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机？

Joe:

当然，如何做到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真的很难解释。对于建造、石头的移动、所需的时间，传统的解释并不充分。如果你每天移动10块石头，我相信建造一座金字塔需要664年。那么，有多少人参与其中？花了多长时间？他们是怎么把石头弄到那里的？他们是怎么想出这些方法的？为什么那些年代较晚的金字塔反而显得不那么精良？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们能够达成如此非凡的成就，以至于即使在今天，4500年后，我们仍然盯着它看，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相信这很难。

Peter:

我认为真正的谜团在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动机。因为你不能住在金字塔里，它只是法老的来世之所。

Joe:

对此有一些争论。克里斯托弗·邓恩是一名工程师，他认为金字塔是某种发电厂。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理论，认为金字塔内部的一个房间与此有关。根据他的理论，地下室通过撞击地球表面和墙壁，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振动。他们有通往王后房间的竖井，这些竖井中会倒入化学物质，而在竖井的末端有石灰石。石灰石是多孔的，气体通过后产生氢气，氢气存在于这个腔室内。

然后，国王的房间里有一些竖井，它们从太空中获取能量，伽马射线和其他来自太空的能量穿过这些房间。这些房间是专门为瞄准这些气体而设计的，并将它们引入这个房间，在那里它们与这种能量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邓恩的理论，而不是我的。他认为这足以产生电能。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疯狂。

Peter:

我通常会很快揭穿这些事情，但回到我们之前的谈话，这确实是一个疯狂的发电厂，拥有比核反应堆大得多的遏制结构。

Joe:

这种想法实在是荒谬，但它涉及一种不同的技术。如果完全排除核技术，他们显然对原子并不了解。然而，他们确实知道来自太空的射线，并且认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利用特定气体的能量，将其转化为某种形式的电能。

Peter:

如果要将如此多的石头堆砌成金字塔，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必须时刻关注发电厂的效率。这不能只是一些普通的反应，而必须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反应，才能证明如此庞大的安全壳结构的合理性。即使是核电站也不经济，它们的作用有限。

Joe:

他们只在吉萨建造了这个发电厂，而其他金字塔则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并且规模更小。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金字塔的真正用途。我们有一群新的考古学家，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结构。他们不再将金字塔视为坟墓，而是考虑它们是否有其他用途。老牌考古学家坚持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坟墓，而较新的考古学家和一些资深考古学家则在研究它们的其他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金字塔的发电概念。

Peter:

我一直对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勒内·吉拉尔的《暴力与神圣》以及这些历史中的君主制和王权的起源感兴趣。吉拉尔和弗雷泽的直觉是，如果每个国王都是一个活着的神，那么我们也必须考虑相反的观点，也许每个神都是一个死去的或被谋杀的国王。社会以某种方式围绕替罪羊组织起来。替罪羊在古代社会中出现于某种危机时刻，人们将责任归咎于替罪羊，并赋予其所有的权力。然后，在某个时刻，替罪羊在被处决之前，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推迟执行死刑，并将权力变成真实的东西。因此，君主和替罪羊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

关于金字塔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第一座金字塔并不需要被发明，只是向受害者扔石头。最初的形式可能是一个社区用石头将受害者砸死，一个部落追赶受害者并用石头将其砸死。这就是创建第一个坟墓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形成了一个由200万块石头构成的坟墓。法老可能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推迟自己的处决或类似的事情。

在古埃及王国，大约在金字塔时代甚至更早的时期，有一个仪式——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在法老统治的第30年，法老会被视为一个活着的神。这可能可以追溯到法老统治的第30年，当时法老会被仪式性地献祭或杀死。在这些社会中，国王通常被允许统治很长时间。你成为国王后，从花瓶中抽出鹅卵石的数量决定了你可以统治多少年。这与古埃及的“塞德节”有关。

Joe:

塞德节是一个古埃及的仪式，庆祝法老的持续统治。这个节日的名字来源于埃及狼神的名字之一，Wipowet或Sed，这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节日名称。

Peter:

这个古老的节日可能是为了取代因年龄或状况而无法继续有效统治的法老被谋杀的仪式而设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塞德节演变成了禧年，其中一些节日已经持续了30年，并且每三到四年举行一次。当杀死法老变得不可想象时，法老就被视为活着的神。在此之前，法老被谋杀后会被当作死去的法老或遥远的神来崇拜。

Joe:

然而，这仍然没有解决工程难题。工程难题是最大的难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关注的是动机难题。即使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动机，如果你想建造一个今天看来疯狂的建筑，而你在4500年前就做到了，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Peter:

我认为动机部分更难解决。如果你能弄清楚动机，你就会想出一种方法来组织整个社会。如果你能让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你很可能就能做到。

Joe:

但你不觉得法老对权力的掌握从一开始就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想出这个把他们变成活神的想法吗？要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权力，然后是工程，再加上对他们用来塑造和移动这些东西的任

何方法的理解。

Peter:

这一直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19世纪人类学家涂尔干之间的人类学争论。

伏尔泰认为宗教起源于牧师们维持权力的阴谋，所以政治先出现，政客们发明了宗教。涂尔干则认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宗教先出现，然后政治从中产生。当然，一旦政治从中产生，牧师和宗教权威就拥有了政治权力，他们想出了操纵它的方法，诸如此类。但我发现涂尔干的故事比伏尔泰的故事更可信。我认为宗教是主要的，政治是次要的。

Joe:

所以你认为宗教先出现。但如果我们来自部落社会呢？部落社会一直都有领导者。当你有领导者时，你就会有异议和挑战，你就会有政治。人们会通过谈判来试图维持权力，保持权力，让一切井然有序。这就是政治的起源。

Peter:

我认为这是对政治起源的粉饰的启蒙理性主义描述。你认为政治的起源是什么？我认为它比这更卑鄙。

Joe:

权力的维持往往伴随着谋杀和破坏，这种行为是极其卑鄙的。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社会契约是通过理性谈判和法律讨论达成的。

当农业和社会机构建立在资源丰富的地区时，文明可能得以发展，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为食物和水而担忧。文明的起源与所有人类冲突的起源一样，充满了暴力和谋杀。最初的社会结构可能是由疯狂和谋杀驱动的。

Peter: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理性。

在猿类社会中，阿尔法雄性通常是最强大的个体，支配地位是自然形成的，通常不需要通过暴力来维持。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两三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对抗阿尔法雄性，这使得文化在权力结构中变得更加重要。语言和沟通使得人们能够协调行动，联合起来对抗领导者，因此，领导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联合。

Joe:

有一部名为《黑猩猩帝国》的Netflix纪录片，展示了黑猩猩社会中的复杂权力结构。尽管黑猩猩社会中也存在暴力和联盟，但并不是最强大的个体总是获胜。纪录片中描述了一只年长且体型较小的黑猩猩通过与其他黑猩猩结盟，成功地在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即使在黑猩猩社会中，权力的获得和维持也不仅仅依赖于体力，而是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策略。

他与所有其他黑猩猩结成了联盟，这些黑猩猩都很尊重他，并且知道它们会受到公平对待。对于黑猩猩来说，得到公平对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们认为事情不公平，它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嫉妒情绪。这正是那个养宠物黑猩猩的人被袭击的原因。

你知道那个养宠物黑猩猩的人，他给自己的黑猩猩带来了一个生日蛋糕，但其他黑猩猩没有得到一块蛋糕。有人不小心把门开着，其他黑猩猩跑出来咬伤了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给它们一些蛋糕。

Peter:

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很有道理。

但我认为我们两个的观点都是对的。关于人类进化的真实故事，关于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有一种讲述方式是将其与我们动物的过去联系起来。黑猩猩、狒狒或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然而，我认为故事的一部分也存在不连续性。在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总是强调连续性，而我对此持有一些保留意见。

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警惕它过于教条化。达尔文的理论可能让我们忽视了某些不连续性。我认为，一种相当戏剧性的不连续性是人类拥有语言。尽管黑猩猩可能——我不知道，它们的智商可能是80左右，它们非常聪明，但当你没有一个丰富的符号系统时，就会导致一种非常不同的结构。

语言及其所允许的协调方式，以及它迫使你采取的行动，使你能够协调暴力，并且鼓励你将暴力引导到某些神圣的宗教方向上。我认为这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我们与其他物种不同——我们讲故事，人类互相讲述故事。很多故事并不是真的，它们是神话。但这与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

这有点像另一种方式来理解ChatGPT和通过图灵测试的意义。如果我们两年前坐在这里，你问我，人类的独特特征是什么？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人类？如何以一种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方式存在？我的首选答案是语言。无论你是一个三岁的孩子，还是一个80岁的老人，几乎所有人类都会说语言，而几乎所有非人类都不会说语言。这是一个二进制的区别。

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通过图灵测试比超级智能或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Joe: 是的，我明白了。抱歉，我不想回到那个话题上。

Peter: 不，不，这是个很好的话题。继续，把它连接起来。继续离题，玩得开心，很棒。

Joe:

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将我们与这些动物区分开来？对此有很多争论，比如是什么因素让我们变成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很大不同。那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比如，人类大脑尺寸在200万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这是整个化石记录中最大的谜团之一。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有许多理论，比如关于投掷手臂的进化或烹饪肉类的影响，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真相。

Peter:

如果允许我稍作语言上的即兴发挥，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在这里有一定的启示。亚里士多德通过分类来区分事物，而他的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更善于模仿。我想说，我们实际上是巨大的模仿机器。

达尔文主义对此的解释是，模仿是猿类的特征，而我们与其他猿类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比它们更擅长模仿。我们的大脑就是巨大的模仿机器，这也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方式——通过模仿父母。文化的传播也是通过模仿实现的。

然而，模仿的许多方面也非常危险，因为它不仅仅发生在象征性的语言层面上。我们还会模仿他人的欲望。如果你想要一根香蕉，我也会想要一根香蕉；如果你想要一个蓝色的球，我可能本来可以接受一个红色的球，但因为你有一个蓝色的球，我也会想要一个蓝色的球。因此，模仿不仅创造了文化，对于教学和学习至关重要，同时也带来了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人类伟大与困扰的核心问题之一，需要我们去解决。

Joe:

那么，模仿的动机是否是我们成为人类的必要第一步呢？

Peter:

有一种解释认为，我们的大脑变大了，因此我们成为了更强大的模仿机器。这使我们能够学习和记住更多的东西，文化传播也因此得以发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制造出更好的武器，变得更加暴力，这其中也包含了非常破坏性的因素。因此，模仿必须以某种仪式化的宗教方式进行，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并行出现。

Joe:

至于身体的适应呢，比如动物形态的改变、大脑的增大、失去毛发、变得像我们一样柔软多肉，而不是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粗糙耐用，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Peter:

我们可以讲述许多回顾性的故事，试图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或许，人类在很多方面确实不如其他猿类强壮，至少在身体上是如此。但这可能只是基本的权衡——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思想和大脑中。虽然我们的拳头没有那么有力，但我们可以制造出更好的工具，比如斧头，这让我们比猿类更强大。或许，我们的大脑消耗了更多的能量，而不是用于长出毛发来保暖。于是，我们用大脑制造斧头，剥下熊皮，获取毛皮来度过寒冬。

Joe:

是的，我想这只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与其他任何动物的进化都不同。那么，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呢？麦肯纳认为是裸盖菇素。我相信你可能听说过这个理论——麦肯纳的“石猿理论”，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理论。当然，关于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Peter:

我想说的是，模仿行为的增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文化语言学的某个维度在其中也非常关键。它可能还与处理随之而来的所有暴力和冲突有关。如果我们与其他人，比如壁画救援队或那个“永生钥匙人”进行交谈，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石像理论。但我总觉得他们对这个理论的解释有些过于粉饰。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如果你有这些疯狂的狄俄尼索斯仪式，人们可能会有很多疯狂的性行为，甚至可能伴随着疯狂的暴力。所以，也许你会因此而变得疯狂，去猎杀猛犸象。尽管在厄琉息斯秘仪期间，他们并没有猎杀猛犸象。

Joe:

我不知道。你可能会去打仗，与邻近的部落作战，这可能比打猎更危险。对，他们确实有这些仪式，也确实发现了其中的痕迹——对此我毫不怀疑。

Peter:

我只是认为，这些仪式可能部分也是一种引导暴力的方式。我们知道维京人在战斗前肯定会吃蘑菇。也许这会降低你的协调性或其他能力，但如果你因此不再那么害怕，那可能非常重要。

Joe:

蘑菇不会降低你的协调性，反而会增加视力，特别是如果你剂量合适的话。它会增强边缘检测能力，使人们更敏感，可能更有意识，甚至成为更好的猎人。

Peter:

我对所有这些关于蘑菇、迷幻药和历史使用的理论都表示同情。我怀疑这些实践在历史上传播得非常广泛，但我认为很多都是在相当违反常理的背景下发生的。

Joe:

我认为这些理论并不相互排斥。考虑到当时的世界状况，暴力肯定无处不在。暴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维系的一部分。在罗马，暴力甚至是一种娱乐形式。暴力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认为，暴力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也促使人们寻求陶醉，尝试不同的体验，以脱离正常的意识状态。

但我确实认为，民主的起源可能也与此有关。在伊利亚西尼神秘仪式中，人们会聚在一起，在一种非常受控的环境下服用迷幻药。我认为，这种环境是许多非常有趣和创新想法的诞生地。

目前许多有趣和创新的想​​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某种改变的意识体验。

Peter:

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强大，绝对不应该被取缔。在所有毒品合法化的问题上，我持有相当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我确实想了解这些事情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在经典的世界观中，这可能是在一个相当受控的环境中进行的事情。你不会每天都这样做，而是偶尔为之。这有点像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你的日常工作，或者你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但你不一定真的想完全转移到另一个世界。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不认为有人会认为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Joe: 这也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

Peter:

你认为界限在哪里？比如说，每个人都应该去体验一次死藤水之旅，还是如果每年去一次死藤水之旅，那是不是太多了？

Joe: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要求。

最近让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FDA拒绝了MDMA的试验。他们本来希望让退伍军人和患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能够接受MDMA治疗。MDMA有极大的临床好处，已知的记录也显示了它的效果。然而，出于某种原因，FDA决定他们必须进行一系列全新的试验，以试图让这种东西合法化，这非常令人失望。

Peter:

我对这件事的发展曾经非常乐观。四五年前，我的想法是，做双盲研究是一种欺骗行为，因为FDA一直坚持你需要做双盲研究。三分之一的人服用安慰剂，三分之二的人服用真正的药物。没有人知道他们吃的是安慰剂还是真正的药物，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效果。科学需要双盲研究。

然而，我的反双盲研究理论是，如果它真的有效，你就不需要双盲研究。它应该直接有效。进行双盲研究有点反社会，因为三分之一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人正在服用安慰剂。我们甚至可以说，进行双盲研究可能是不道德的。对独特和新颖的东西进行双盲研究是有意义的，但MDMA和迷幻药并不新颖，它们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我的主张是，如果它真的有效，你根本不需要进行双盲研究。我希望MDMA、迷幻药等能够突破双盲研究的标准，因为人们会知道他们是否服用了真正的药物还是安慰剂。因此，这是一种突破荒谬的双盲标准并完成研究的方法。

我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FDA的反毒品意识形态，但在科学界和科学机构层面上，他们仍然认为你需要进行双盲研究。然而，Joe，我们知道你在破坏这项双盲研究，因为人们会知道他们是否服用了安慰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随意调整目标，并将其设置得更加严格，因为我们知道无法进行双盲研究。如果研究不是双盲的，那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与我们的科学意识形态相悖。我认为，这也是这件事在政治上失控的部分原因之一。

Joe:

此外，我认为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使用MDMA疗法对退伍军人有极大的好处，并且这种疗法开始广泛应用且效果显著，那么这将为其他迷幻化合物的使用打开大门。我认为，这对当权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如果人们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可以回顾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他们对一切泼冷水，并将迷幻药列为一级管制药品，封锁了整个国家的迷幻药获取途径。所有这些措

施都是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反映。如果这些事情在今天发生，将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文化体系、治理方式，甚至资源分配方式造成巨大冲击，所有这些都将发生改变。

Peter: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向内的转变是对外部世界改变的补充，还是一种替代？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关于谈话和行动的问题，它是改变外部世界的补充，还是一种替代？我们专注于改变自己，这是否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还是一种将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心的催眠方式？对此，我并不确定。

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句话：我们于1969年7月登陆月球，三周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开始，嬉皮士文化接管了整个国家，我们不再探索外太空，而是开始探索内心世界。因此，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这种内在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激活剂或减活剂的作用。

内在性有多种形式，包括心理治疗、冥想、瑜伽，甚至性革命。渐渐地，我们看到一些非自愿独身者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玩电子游戏。这种自我沉思也体现在身份政治中，还有一系列与迷幻药相关的现象。我想知道，内在性最终是否起到了替代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种历史是，嬉皮士实际上是反政治的。毒品泛滥发生在60年代末，那时人们开始脱离政治，就像披头士乐队的歌所表达的那样。如果你随身带着Sharon Mowry的照片，你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任何人发生关系。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吸食迷幻药之后，那种疯狂的政治不再重要。因此，我们看到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的发生，那么毒品是否是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因素呢？或许那正是那些事情开始缓和的原因之一。

Joe:

我认为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越南战争与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药运动几乎是同步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对当权派如此具有威胁性。因为那些参与迷幻药运动的人不太可能相信他们需要飞往越南去杀死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也不太可能支持任何形式的战争。

当时有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奇怪运动，即所谓的“花童运动”。我们知道这些人被认为是在密谋反对当权派。如果你读过汤姆·奥尼尔的《混沌》，你会发现这本书非常出色。它展示了当局如何试图妖魔化这些嬉皮士。而其中一个有趣的部分是MKUltra项目。

Peter:

是的，MKUltra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个项目的前身可以被视为我们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军备竞赛。他们非常擅长洗脑人们，比如戈培尔的宣传手段，以及朝鲜人在朝鲜战争中对我们的士兵和战俘进行的洗脑。我们需要进行一场军备竞赛，以编程、重新编程和解除编程人们的思想。而LSD则成为了MKUltra的捷径。

因此，我认为——尽管很难重建整个事件的全貌——但我怀疑MKUltra事件的规模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它是哈佛和斯坦福形式的LSD运动的起源。这个运动始于一个MKUltra项目，哈佛大学的蒂莫西·利里和斯坦福大学的肯·克西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我认识美国小说家汤姆·沃尔夫，我仍然认为他最伟大的小说是《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LSD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历史始于斯坦福，然后转移到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但这一切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58年左右，当时肯·克西还是斯坦福的研究生。如果你去门洛帕克退伍军人医院，他们会给你一些随机药物，每天可以多赚75美元。是的，作为一名英语研究生，服用LSD可以多赚75美元。

汤姆·沃尔夫在1968年写了一部标志性的虚构小说，非常现实。然而，沃尔夫无法想象整个事情是从某个CIA的精神控制项目开始的。门洛帕克退伍军人医院与深层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当然，中央情报局还经营着海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这一切都显得更加疯狂。

Joe:

是的，Jolly West的家伙——整个事情都很疯狂。这让我想到，你认为他们今天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当时做了这些事情，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对人进行编程的想法。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因为我知道这种方法是有用的。

你看，人们每天都在加入各种邪教。我们很清楚，人们可以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我们也很清楚，只要人们所属的社区支持，他们就会接受一些疯狂的想法。这只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也许这就是你所说的部分原因，我们拥有这种模仿能力，这导致我们这样做。如果他们具备这种知识和理解，那么今天他们肯定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这让我想起那个曾试图刺杀特朗普的人。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我们从未得到关于这个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详细解释——他们是如何上到屋顶的？他们是如何到达那个位置的？他们是如何训练的？他们与谁联系？谁在教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我对此非常好奇。

一直以来都有“满洲候选人”的概念，对吧？这个概念是指我们训练刺客。这让我联想到1960年罗伯特·肯尼迪父亲的暗杀事件。

Peter:

再说一次，也许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但他声称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那是一种催眠状态或其他什么，就像《满洲候选人》中的刺客一样。

Joe:

是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他可能只是精神崩溃了。谁知道呢？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解释。

然而，这种可能性不应被忽视。我的意思是，这个年轻人做了这件事，向总统开枪，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真的想知道背后的真相。

Peter:

我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历史上的阴谋论。我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40年代，美国发生了很多类似的疯狂事件。在50年代和60年代，有曼哈顿计划，这个巨大的秘密计划。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我认为——我不确定这是否令人不安，但我的观点是，这些机构的功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我不认为中央情报局现在还在进行类似于MKUltra的项目。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我觉得在70年代后期，教会委员会的听证会揭露了很多事情。当官僚机构被迫正规化时，它的功能性可能会大大降低。

就像2000年代的情况一样，我认为我们在黑监狱里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比如中情局在反恐战争中派遣人员进行酷刑，还有水刑等各种手段。然而，一旦小布什政府的约翰·尤写下了酷刑备忘录并将其正式化，比如规定你可以用水灌人多少次而不会被视为酷刑，等等，一旦这些行为被正式化，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们即将被淘汰，因为它们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2007年，在关塔那摩，我认为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混乱，囚犯和辩护律师似乎在掌控局面。在关塔那摩，作为一名穆斯林恐怖分子，可能比在曼哈顿作为一名涉嫌杀害警察的凶手要安

全得多。曼哈顿仍然有一个非正式的程序，如果你是一名涉嫌杀害警察的凶手，情况会非常不同。他们可能会想出某种方式，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之外处理你。但我认为，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某种形式化的变化。

在J. Edgar Hoover离开联邦调查局后，Hoover一意孤行，一切都完全失控了，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然后，一旦一切都被曝光，可能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能作为一个深层政府实体存在了更长时间，至少它有这个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它仍然被称为“没有这样的机构”。因此，它仍然更加隐秘。如果深层政府的某些部分在进行某些活动，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至于2000年代和2010年代的历史，我认为《爱国者法案》赋予了FISA法庭极大的权力。我认为，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FISA法庭程序以一种非常疯狂的方式武器化。这在2016年达到了顶峰，所有针对特朗普的疯狂俄罗斯阴谋论都与此有关。但即使如此，我也不确定他们还能做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被曝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Joe:

FISA法庭程序本来是一个绝密的小程序，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从人们那里获取信息。

Peter:

我同意你的观点，NSA的FISA法庭程序从2003年到2017年、2018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这是相对较近的历史。

关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各种阴谋论，我可能太过着迷，因为感觉他们能够掩盖一些疯狂的事情，现在仍然如此。但我们仍在谈论杰弗里·爱泼斯坦，这难道不说明我们很难想出其他事情吗？

Joe:

不，因为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事件没有明确的答案。除了吉斯兰·麦克斯韦入狱和杰弗里·爱泼斯坦涉嫌自杀（我不认为他自杀了）之外，没有其他后果。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后果？他们能够完成这件事，某种行动。谁知道幕后黑手是谁？谁知道动机是什么？但这显然与妥协有关，这是一种古老的策略，可以让人们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你掌握了他们的情报，用这些情报作为筹码，然后你会听到别人说你想让他们说的话。这会推动政策，改变事情，完成任务。他们做到了，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然而，没有人要求提供录音带，没有人要求提供客户名单，我们一无所知，至今如此。

Peter:

可能，我不知道，我花了太多时间思考爱泼斯坦的所有变种。可能性爱的内容被夸大了，其他内容都没有做到。这就像是一次有限的聚会。我们可以谈论疯狂的未成年人性行为，而不是其他问题。就像亚历克斯·阿科斯塔为劳工部长作证一样。他是2008-2009年起诉爱泼斯坦的地区检察官，并最终让爱泼斯坦被判处13个月或更轻的刑期。他当时是南佛罗里达州的检察官，或者担任其他类似的职位。有人曾问阿科斯塔，为什么爱泼斯坦能够如此轻易地逃脱惩罚。

2017年，当阿科斯塔竞选劳工部长时，他在国会作证时提到自己属于情报部门。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而在于他为什么受到如此保护。

我开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思考他是否为以色列人、摩萨德或其他类似组织工作。然而，我逐渐认为这些问题是次要的。显然，这只是美国内部的问题。如果他为以色列工作，他不会受到如此保护。我们有乔纳森·波拉德的例子，他被判入狱约25年。因此，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果这是一次情报行动，我们应该问的是他为美国情报系统的哪个部分工作。

Joe:

你不觉得控制政客、让他们卷入性丑闻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吗？这一直是政客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看看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那只是总统和工作人员之间自愿的、不恰当的性关系，却几乎推翻了总统职位，并导致他被弹劾。这种情况带来了强大的动机和耻辱，甚至涉及非法活动。事实上，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我们能想到的最令人厌恶的事情之一。

Peter:

我敢肯定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怀疑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值得探讨。

Joe:

毫无疑问，这种丑闻是掌握政客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尤其是那些可能毁掉职业生涯的丑闻。特别是那些深深植根于系统中的人，他们了解他人的情况，并利用这些信息。这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策略，正如J. 埃德加·胡佛的整个运作方式。

Peter:

然而，我的看法是，这与J. 埃德加·胡佛事件略有不同。问题在于，做这些事的人是否知道自己受到了损害。这种感觉并不是你以某种方式受到了损害，而更像是你加入了一个秘密俱乐部。你必须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一员，才能做出疯狂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对你有把握时，你才能成功。

这让我想起了骷髅会和类似的秘密组织，甚至梵蒂冈的秘密。有人声称天主教会80%的红衣主教都是同性恋，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基本论点是，如果你是异性恋，你就不会晋升为红衣主教，因为我们需要你在某种程度上被妥协。然后你就被控制了，但你也会取得进步。

Joe:

这完全有道理，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质上像坏演员的政客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只是想要权力和控制，很多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喜欢聚会。

有两种类型的领导人担任总统：一种是胆小鬼，另一种是好战分子。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但一般不会。像克林顿和肯尼迪这样的人是反战的，而像布什这样的人，你根本不会认为他是胆小鬼，但你肯定会认为他是好战分子。

Peter:

你对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共谋有什么看法？

Joe:

我认为他喜欢胆小鬼。我认为他是个男人，他喜欢权力，喜欢垄断。他在微软非常有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恶棍，一个反垄断恶棍。他垄断了操作系统，控制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帝国，名声很

差。然后，我认为他明智地转向了慈善事业。

Peter:

但你认为他需要爱泼斯坦吗？

Joe:

我认为，一个非常有名、非常高调的人很难乱搞。我认为这非常困难，因为你必须担心别人会告诉别人。如果你有外遇，你会担心它会把你拖垮。如果你经营着某个慈善组织，你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真的想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人。但实际上，他只是到处飞，和各种各样的女人鬼混。你必须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Eric Weinstein和我讨论过的问题。Eric的立场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可以为你提供经验，并为这种群体中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付给人们足够的钱，并且人们有动力建立这些关系，确保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当你变得非常高调时，你就不能只出现在约会应用程序上。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勾搭女人的男人，你会怎么做？

Peter: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但我想知道是否有关于爱泼斯坦的更直接的替代阴谋论是我们遗漏的。所以让我来谈谈比尔·盖茨的另一个阴谋论。

当然，看看显而易见的东西。据说他很早就和爱泼斯坦谈过他的婚姻不太好，然后爱泼斯坦建议他应该在2010年、2011年左右离婚。盖茨告诉他一些事情，但这些建议不太管用，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婚前协议。所以，爱泼斯坦作为婚姻顾问的一部分，有点令人不安。

但我们知道盖茨与爱泼斯坦谈论的第二件事是，所有关于资金合作、建立慈善事业以及所有这些有点腐败的左翼慈善结构的事情。所以有一个问题，然后我的直截了当的替代阴谋论是我们应该问——我们应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吗？

你知道，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件事的所有细节，但它可能是这样的：比尔和梅琳达在1994年结婚，他们没有签署婚前协议，婚姻出了问题。也许梅琳达在离婚时可以得到一半的财产，但他不希望她得到这

些钱。你会怎么做呢？于是，他制定了一个替代计划——将婚姻资产转移给一个非营利组织。这样一来，梅琳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对这段婚姻提出异议。

这种做法在左翼慈善界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婴儿潮一代中，这似乎成了一种控制他们“疯狂妻子”的方式，或者类似的手段。同时，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粉饰过去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他曾与爱泼斯坦讨论过此事，并安排爱泼斯坦与诺贝尔奖基金会的负责人会面。是的，比尔·盖茨确实想获得诺贝尔奖。

这一切其实并不复杂，这些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

Joe:

我并不是在质疑你所说的——你了解诺贝尔奖的历史吗？那是终极的粉饰。诺贝尔奖的设立源于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他意识到自己被称为“死亡商人”，这让他感到震惊。他不希望自己以这种形象被世人记住，于是他发明了诺贝尔奖。如今，在大多数人眼中，诺贝尔这个名字自动与那些为社会、科学、艺术、和平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联系在一起。

诺贝尔奖的历史确实非常疯狂，但它也是最终的粉饰。诺贝尔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就是为了公开改变自己的形象。而比尔·盖茨想获得诺贝尔奖，这种愿望虽然讽刺，但也可以理解。

Peter: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话题，会发现其中有爱泼斯坦的未成年性行为丑闻、诺贝尔奖的复杂历史、左翼慈善事业的腐败，以及婴儿潮一代没有签署婚前协议的故事。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

至于左翼慈善事业的腐败之处，我认为这可能只是我的怀疑解释，但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美德信号及其背后的含义。在美国，我们被告知慈善是好人做的事，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开始捐出他们的财富，这被视为一种善行，表明他们的道德高尚。然而，欧洲人对此的直觉是，这可能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如果你开始把所有的钱都捐给欧洲，那就像是，乔，你一定是谋杀了某人，或者你一定是在掩盖什么。这反映了两种非常不同的直觉。我认为欧洲的观点比美国的更为正确。也许在历史上，左翼慈善事业在2007年、2010年和2012年达到了顶峰。而且，我们社会的敏感性已经变得更加欧洲化，这种变化是微妙的，但与12或14年前相比，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问比尔·盖茨的所有这些问题，就像当年在90年代微软反垄断审判中的所有证词一样，盖茨似乎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他想扼杀竞争对手，甚至切断他们的“空气供应”。随后，他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粉饰行动，但这种粉饰行为最终变得过于透明，并被互联网或其他力量解构和揭露。

Joe:

我认为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多少粉饰行为，包括向媒体公司捐赠约3亿多美元，实际上是在购买对他的好评。

盖茨的慈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慈善，它是慈善与公关的结合，因为他一直在接受有关此事的采访。这并不像是一个默默地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各种事业的人，他在各种脱口秀节目中倡导这些观点，并不断谈论我们需要如何做事。在大流行期间，他成为了一个非常直言不讳的声音，甚至不知何故成为了一名公共卫生专家。然而，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听取一个对某些特定疗法有经济利益的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建议。

Peter:

我可以给出所有这些替代版本的解释，但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我们的文化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总是很难的。我同意你所说的，但我也认为这种策略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人们现在有办法看穿这些伎俩。虽然并不总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清晰，但当盖茨先生只穿着毛衣，看起来像罗杰斯先生时，人们会有一种模糊的直觉，觉得一定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在发生。

人们更愿意相信杰夫·贝佐斯和他的紧身衬衫，或者埃隆·马斯克在院子里和女朋友一起闲逛的形象。恶习信号比美德信号更安全，因为当你在发出美德信号时，我们的直觉会变得非常非常可疑。

Joe:

我们变得更加怀疑，尤其是当有人在公开做某事时。考虑到盖茨的历史背景——你知道他之前参与过什么，你知道他如何经营微软的——向媒体付钱是一个聪明的举动。

Peter: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这与对盖茨的看法并不矛盾，那就是梅琳达最终在2021年初提出了离婚。我认为，梅琳达在2019年底告诉比尔她想要离婚。因此，2020年，比尔·盖茨在应对COVID-19疫情上投入

了大量精力。这其中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自私，他可能希望从制药公司或类似的行业中获利。但另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他需要限制梅琳达，并迫使她不要拿出太多钱吗？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钱最终都会流向盖茨基金会。

梅琳达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要一半的钱？反正这些钱都会流向盖茨基金会，我们也不会给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在面对COVID-19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梅琳达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她应该得到一半的财产。这就是在没有婚前协议的情况下离婚时通常会得到的结果。

然而，如果比尔在COVID-19问题上采取了超负荷的应对措施，梅琳达可能会被质疑：“你是一个反科学的疯狂人物吗？”我不确定，但我的推测是，我们不应该低估比尔在这件事上有多少是为了控制他的前妻，而不是控制整个社会。这种动机是有道理的，而且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的时间线与这一推测非常吻合。

Joe:

我们可能在谈论的是数十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财产分割问题。

Peter:

我认为梅琳达最终得到的财产不到她应得的一半，可能只有十分之一。这令人惊讶，比尔竟然能将分割的财产降到如此低的水平。

每次比尔在电视上谈论COVID-19时，梅琳达和她的左翼朋友们可能都感到被困住了。

Joe:

这是一种有趣的哲学思考。如果你是比尔，这确实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聪明方法。非常明智，非常聪明。如果你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这确实是一个天才的举动，而比尔显然是个聪明的人，这一切都很有道理。

我不确定，但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或许应该有婚前协议，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确实有些疯狂，但也很有趣。我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但现在看来确实很有道理。

不幸的是，梅琳达一直直言不讳地表示，比尔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是她想要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Peter：

那么，比尔通过爱泼斯坦有婚外情吗？或者从梅琳达的角度来看，爱泼斯坦促成了婚外情，这会更糟糕吗？又或者，爱泼斯坦建议比尔如何在不给梅琳达任何钱的情况下甩掉她，这会更糟糕吗？我认为，从梅琳达的角度来看，后者可能是最糟糕的。

Joe：

这确实有道理，完全有道理。您认为爱泼斯坦是比尔的合法财务顾问吗？比尔·盖茨是否会有更高效的助手？当你处于那样的财富水平时，我相信你会有非常高水平的财富管理人员。埃里克曾对他说过一些话，其中之一就是他觉得爱泼斯坦是个骗子。埃里克认为，爱泼斯坦对自己所说的东西了解不够。

Peter：我也曾几次见过爱泼斯坦。

Joe：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Peter：

2014年，硅谷的Reid Hoffman介绍我们认识。但基本上，我没有查证，也没有问足够多的问题。不过，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是欺诈性的。我确实认为爱泼斯坦对税收了解很多，可能还掌握一些复杂的方法来构建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在婚姻背景下，他可能对此非常了解。

我不认为爱泼斯坦能够评论超弦理论或类似的东西，但他可能确实对税务和非营利组织的构建非常了解。他被描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税务人员之一。

这很有趣。可能是我的道德弱点……

Joe：好吧，你当时怎么会知道呢？他从未被捕过。

Peter:

不，这是在2014年之后，他已经被捕过了。哦，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被捕之后的事，对吧？是的，那是在2007年或2008年。

但你可能认为他没有坐牢那么久，或者认为指控没有那么严重。当然，我有一种错觉，以为我可以信任所有这些人。介绍我们认识的Reid Hoffman，他创办了LinkedIn，可能过于专注于商业网络。但我认为他总是能很好地判断人。

Joe: 当爱泼斯坦第二次被捕时，你是不是觉得，哦，好吧，你明白了吗？

Peter:

是的，我对此想了很多。天啊，他欺骗了很多。我认识很多见过那个人的人。他邀请了很多名人来他家参加派对之类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你可以加入的秘密俱乐部、秘密社团。

Joe:

当然，这并不是明确的，但那是整个事情的模糊氛围。人们喜欢那些愚蠢的东西，他们喜欢那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的专属俱乐部——看看那个该死的Soho House，看看那些愚蠢的东西。你只需要去一个必须是会员才能进入的地方，每个人都想成为会员。然后你得到了像Malibu Soho House那样的地方，它与其他地方不同，你必须在那里拥有会员资格。你有那里的会员资格吗？人们喜欢那种东西。在社交方面，他们喜欢成为围墙花园的一部分。他们喜欢这种感觉。如果你是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富人，你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可以与你产生联系，信任的人也很少，可能很难建立新的友谊。

Peter:

我认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当然，我个人被税收问题困扰，而其他人可能更容易沉迷于社交俱乐部的放荡生活。也许有一个相当有限的群体，真正了解这些社交俱乐部的运作方式。

Joe:

知道真相不是很棒吗？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也许某个像惠特尼·韦伯那样的人物会把这一切都分解给我们，详细解释这些俱乐部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从人们那里获取信息的。

Peter:

但我认为，人们必须变老，甚至去世，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些事情。比如，肯尼迪遇刺事件至今仍没有完整的报道，这实在是太疯狂了。肯尼迪遇刺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谜团。

Joe:

特朗普曾说过一句非常疯狂的话：“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告诉我的东西，你也不会告诉别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从法律上讲，他不能透露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事情可能是绝密的。如果他们确实告诉了他一些事情，那么就必须有某种保密的先决条件。

Peter:

关于谁杀死了肯尼迪，有很多不同的阴谋论。有的说是中央情报局，有的说是黑手党、俄罗斯人、古巴人，甚至还有一个版本认为是林登·约翰逊，因为他是受益者。这些理论在德克萨斯州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1963年的美国是一个表面之下非常疯狂的国家。

尽管大多数阴谋论可能都是错误的，但它们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所有这些都出于不同的原因想要肯尼迪死。这就是说，尽管这些理论在事实细节层面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它们的核心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我愿意接受一种更简单的解释，从已经曝光的资料来看，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奥斯瓦尔德曾与美国深层政府的某些人士有过接触。即使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刺客，你也能以某种方式让“魔法子弹”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成立。但假设奥斯瓦尔德确实是唯一的刺客，他有没有告诉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他打算去杀肯尼迪？也许中央情报局不必亲自动手，只是袖手旁观。或者，可能是奥斯瓦尔德太无能，没有向官僚机构报告他的计划。

总之，我们大概知道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前与奥斯瓦尔德有过多次接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处理得非常不称职。

Joe:

我认为，人们对两个互相排斥的故事存在分歧：一个是独行枪手的说法，另一个是中情局谋杀了肯尼迪的说法。这两个故事之间似乎没有联系。

我认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确实参与了其中。他可能真的枪杀了那名警察。有证据表明，当他在逃亡时与警察对峙，其中一名警察被枪杀了，他们指控他可能是凶手。他也可能向肯尼迪开了枪，甚至可能击中了他。但我不认为他是唯一的枪手。

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听到了从草丛中传来的枪声。据报道，他们还看到了人影。目击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人数神秘死亡，这一点相当令人震惊。

杰克·鲁比的行为也很奇怪。他走到奥斯瓦尔德面前，开枪打死了他。虽然鲁比之前没有精神病史，但在乔利·韦斯特来访后，他却完全疯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MKUltra的负责人会去拜访那个射杀总统刺客的人？为什么他被单独留在鲁比身边？发生了什么？他给了鲁比什么？鲁比在那里尖叫着“活活烧死犹太人”，简直疯了。他大喊大叫，表现得非常疯狂。可能是服用了某种对他有害的LSD，剂量可能很大。他们可能给了他一杯，告诉他这是水，谁知道呢？

但关键是，我认为奥斯瓦尔德很可能参与了刺杀事件。他们枪杀奥斯瓦尔德的方式，以及随后编写的沃伦委员会报告，都让人怀疑。我们甚至直到12年后才在电视上看到Zapruder影片。当迪克·格雷戈里把影片带给杰拉尔多·里维拉时，这一切显得非常疯狂。一位喜剧演员展示了刺杀事件的实际影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肯尼迪被枪击的瞬间。他的头猛地向后向左转，每个人都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你看到所有这些事情时，这反映了发生在这个骗子身上的事情。这个骗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屋顶上，被这些人发现了。他们知道他在那里，知道他有一支步枪，还看到他半小时前拿着测距仪在犯罪现场走来走去。整个事情都显得非常疯狂。

然后，他们在他被杀后去了他家，发现房子被彻底打扫干净了，甚至没有餐具。他们还知道有广告数据显示，来自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一部电话曾多次拜访过他，因为他们跟踪了广告数据。

如果那个人——如果他开枪打死了特朗普，特朗普被谋杀，然后他们开枪打死了他，那将是肯尼迪遇刺案的重演。每个人都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动机是什么？他是否吸毒了？毒理学报告显示了什么？他是怎么上去的？谁知道他上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快地射杀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怎么能连开三枪？究竟发生了什么？

Peter:

我认为还有一个稍微不那么疯狂的可能性，那就是特勤局或拜登政府中的某些人不喜欢特朗普。他们可能并没有完全打算杀死他，而是没有尽全力保护他。他们可能只是让人手不足，或者没有与当地警方进行充分的协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某人处于更不安全的境地。

Joe:

但这似乎不仅仅是疏忽。如果他们知道那个家伙拿着步枪在屋顶上，这就不仅仅是疏忽的问题了。不过，问题在于“他们”是谁。我认为当局之前就知道这个人在屋顶上。

Peter: 我怀疑特勤局的一些人已经被告知了这一点。然后，谁知道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或者谁是安全的。

Joe:

那么，狙击手不是已经盯上他了吗？我相信狙击手已经盯上他了，但我不确定。我们需要查明这一点。

Peter:

特勤局表示，他们不知道狙击手的情况。我对射击不太了解，也许你对此有更好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对于那个人来说，这是一场相当直接的射击，而特朗普的刺客将是刺客。我认为奥斯瓦尔德的射击要困难得多，因为肯尼迪在移动。

Joe:

是也不是。因为奥斯瓦尔德有一个瞄准镜，他使用的是马卡诺步枪。驻扎在大楼内的一名狙击手报告说，他首先看到克鲁克斯在外面，抬头看着大楼的屋顶，然后嫌疑人离开了现场。克鲁克斯回来后，坐在大楼附近看着他的手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说，一名狙击手在嫌疑人回来时拍了一张照片。我认为他们在屋顶上看到了他。克鲁克斯随后拿出了测距仪，就在那时，他们逮捕了那个人。他用测距仪记录了嫌疑犯的行动。然后，克鲁克斯又消失了，背着背包回到了大楼，再次被逮捕。特勤局狙击手再次向指挥所报告了克鲁克斯的行动。

据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消息人士称，当更多警员赶到现场进行支援时，克鲁克斯已经爬上了涉事大楼的顶部。嫌疑人还站在大楼内狙击手的上方和后方。当警察开始赶赴现场，其他警员试图爬上屋顶时，消息人士告诉 CBS 新闻，另一名特勤局狙击手已经杀死了克鲁克斯。

所以看起来他们每一步都搞砸了。如果他们知道那家伙在那里，如果他们知道他有测距仪，他会转向背包，爬上屋顶。这一切都太疯狂了，至少可以说，这是可怕的无能。

Peter:

回到迈克的话题。我原以为这次射击会容易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Joe: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爆头，他朝自己的头部开枪。

Peter: 为什么选择头部？难道他不应该朝身体中部开枪吗？

Joe: 你不知道他是否穿着防弹背心，他可能确实穿着背心。要挡住步枪子弹，你必须有护板，尤其是陶瓷护板。

Peter: 那么，他使用的是.308口径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武器？

Joe:

我认为他使用的是AR-15。现在的瞄准镜比以前好多了吗？但我们很确定他没有使用瞄准镜。

至于奥斯瓦尔德的瞄准镜，它的质量如何？有人说它不准，这是阴谋论之一。但瞄准镜不准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瞄准镜可能会脱落。如果你把它撞到墙上，或者当他把枪掉在地上时，瞄准镜撞到窗台然后弹开，瞄准镜就可能失效。

Peter: 奥斯瓦尔德的高角度射击是否增加了难度？

Joe:

其实并没有。射击本身并不困难，难的是快速射出三枪。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三枪归咎于奥斯瓦尔德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是三枪造成的，因为其中一枪击中了跳弹。那颗子弹飞入地下通道，从路边反弹，击中了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一名男子。他们找到了子弹击中的位置，因此知道有一颗子弹没有击中肯尼迪，而是击中了路边，这表明有人从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类似的位置开枪。

他们当然知道肯尼迪头部有一处伤口，还知道肯尼迪脖子上有一处伤口。这就是所谓的“神奇子弹理论”。他们必须提出这个理论，因为他们需要将所有这些伤口都归因于一颗子弹。然后，他们发现了一颗完好无损的子弹。当他们把康诺利州长带进来时，他们在轮床上发现了这颗子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子弹没有变形，尽管它穿过了两个人，并在康诺利的手腕上留下了更多子弹碎片，但子弹本身却没有变形。更不可思议的是，子弹在打碎骨头后依然保持完好。

这一切都太疯狂了，完全违背逻辑。这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对子弹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当子弹射入物体时，它们会变形。这是不可避免的。而那颗子弹看起来就像是被射入了游泳池，完全没有变形。

Peter:

你能找到比《东方快车谋杀案》更具体的东西吗？可能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俄罗斯人、古巴人、黑手党都有可能。

Joe: 好吧，12年来没有人怀疑过，但我认为很多人都曾怀疑过。

Peter: 当然，有些人可能只是稍微怀疑，但你有什么依据呢？

Joe:

你不需要任何依据，就像那个骗子孩子的故事一样。我们没有任何依据，我们会被遗忘，就像我们被遗忘在爱泼斯坦事件中的信息一样。没有人知道真相，那些组织这一切的人——如果真的有人组织了这一切——你永远不会听说他们的名字。肯尼迪的死亡可能会被遗忘，新闻周期将继续被各种无稽之谈所充斥。我认为，可能有多个团体希望肯尼迪死去，甚至这些团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勾结。许多人有既得利益，希望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因为他对许多当权者来说是个危险人物。他的著名演讲中提到的秘密社团，内容相当激进。这个人发表了这样的演讲，然后就被谋杀了，整个事件显得非常疯狂。

Peter:

肯尼迪想摆脱中央情报局，他有很多计划，也做了许多大胆的事情。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1962年，我们与苏联达成协议，他们撤出古巴的导弹，而我们承诺不再试图推翻古巴政府。尽管如此，我认为仍有四五次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企图。实际上，在肯尼迪遇刺前一两个月，卡斯特罗曾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这种行为，可能会有后果。

Joe: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肯尼迪死去，并且他们可能会协调行动。如果古巴想让肯尼迪死，而且他们有能力找到刺客或提供其他帮助，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进行一些疯狂的行动，比如“北方森林行动”。

Peter:

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阴谋的世界。

然而，我认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已经大大减少。信息更难隐藏，举报人、遗留程序和内部记录使得阴谋更容易被揭露。即使是像NSA FISA法庭那样的深层政府事件，在2016年、2017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怀疑现在是否还能行得通，因为人们知道自己被监视和记录。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政府的能力和功能感到担忧。我们的深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无能，这让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在进步。回顾1963年的美国，最疯狂的版本是我们的深层政府能够击倒总统。也许，这实际上是一个比疯狂版本更高效的社会，因为在那个版本中，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被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的问题困住了，甚至无法让枪手在步枪上安装瞄准镜等设备。我们还不确定他的步枪上是否有瞄准镜，但我认为他没有。

Joe: 这件事的规模要大得多——你能找到像奥斯瓦尔德那样有能力的人吗？

Peter:

这是个好问题。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严重的无能，但我不确定这是否会使情况好转，甚至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Joe:

我认为他们的能力不足，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人来执行这件事，而且效率不高。如果有更好的组织，就不会只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Peter:

我知道有些人可以在一英里外杀死一个人，但这种方式非常有效，你可以独自行动。组织起来很难，因为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这是事实。

Joe:

这让我想起了你提到的掌握人们污点的事情，为什么爱泼斯坦的信息没有被公布，以及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这么做。如果你掌握了人们的污点，那么你知道那些人不会告发你，你们会一起协调。

Peter:

这仍然是我论点的一个奇怪反驳——为什么这些污点还没有被曝光？所以不知何故，这个机制仍然在运作。

Joe:

是的，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运作着。只是每个人都知道它在运作，但对什么都没有发生感到沮丧。就像朱利安·阿桑奇被捕并在使馆被关押了很长时间，最近才终于被释放。但他不是必须删除一堆电子邮件才能被释放吗？

Peter:

再说一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桑奇和斯诺登的事件显示了一个失控的深层政府，它正在吸收世界上所有的数据。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那样的100倍夸张的情节，没有爆炸性的雪茄暗杀阴谋。我们对此做得太少了。

看起来他们不必这么做，或者至少——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代理性要小得多。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我希望你对他们处理海外事务的方式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真的很擅长。

Joe:

这让我想到了整个不明飞行物（UAP）事件，因为我对UAP事件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它们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很多东西。我认为有一些秘密计划超出了国会的监督范围，它们在推进方面做了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大多数人目前对火箭和其他推动物体飞行的传统方式有一定的理解，但我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其他方法。我认为这些UAP是无人机，它们可能使用某种反重力技术。

Peter:

推进系统可能是一种占位符理论，或者你认为这比外星人更甚？或者你认为外星人和外星人都是这样？

Joe: 后者。我认为两者都是。

Peter: 你认为两者都是？

Joe: 是的。我认为我们没有被访问过，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如果其他地方存在生命，那肯定应该存在。这很有道理。

Peter: 你认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UFO目击事件已经是无人机计划了吗？它们已经那么先进了吗？

Joe:

不。这些都是让我停下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给我的喜剧俱乐部起名为“喜剧母舰”时，它的主题都是UFO。我们的房间被命名为“胖子”和“小男孩”，这些房间以核弹命名，因为当那些核弹被投下时，每个人都会开始看到这些东西。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复杂社会，我会认识到有一个聪明的物种已经开发了核能并开始将其用作炸弹，我会立即开始访问。我会让他们知道，嘿，混蛋，有比你们先进得多的东西。我会盘旋在核基地上空，关闭他们的导弹。我会做所有据说UFO会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制衡政府，只是想，嘿，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所有智慧物种都会经历这个过渡时期。他们有能力利用不可思议的力量，但他们仍然有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他们有这些领土猿猴的大脑，但现在却有利用星星的力量，把它们扔到城市里。我想那时我就会开始拜访他们。

我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甚至在那之前，都有关于这些事情的非常奇怪的记载，一直追溯到圣经里的以西结书。关于这些在太空中飞行的东西的描述非常奇怪，而且数量众多。古印度文献中也有维曼拿。这些东西太多了，你不得不好奇。

你得想想，如果我们把无人机送上火星，而且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我们现在就有一辆火星车在火星上四处奔波收集数据。我们会把詹姆斯·韦伯望远镜送上太空吗？当然会。我们把很多东西送上了太空。如果我们再活一百万年而不自爆，这对宇宙中一些行星的寿命来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会先进多少？如果我们是星际旅行者，并且我们发现有一个原始物种正在成熟，我想我们会开始拜访他们。

Peter:

让我想想，我听到了你说的一切。奇怪的是，我对此缺乏动力。

我也是。即使它是合理的。

我也是。信不信由你，我想关于外星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更疯狂、更有趣的。我不知道，罗斯威尔事件是77年前，1947年。如果这种现象是真实的，它来自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太空。外星人、太空机器人等现象的一个关键特征可能是它们的短暂性或隐形性。它们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甚至在被人类目击后，还能通过某种方式扰乱人们的大脑，或进行类似的操作。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人员，你必须选择那些可以取得进展的领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学术界虽然混乱，但即使学术界没有混乱，这也不是一个适合从事职业的领域，因为在过去的77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Jacques Vallée或其他在这个领域工作了50年的人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感觉这里有些东西存在。然而，当你觉得自己快要理解某些现象时，比如通过TikTok视频或其他方式，它们总是处于可识别的边缘。短暂性是这些现象的一个关键特征。

也许你需要有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就像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在时间间隔0到T之间，某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但在下一分钟或明年，它们可能会发生。你在机场等待行李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李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如果一小时后行李还没出现，可能就丢失了。如果你一年后还在机场等，那显然是个愚蠢的想法。在某个时刻，你必须接受行李已经丢失的事实。77年可能就像在机场等待了77分钟，77分钟后，你应该开始感到非常沮丧。

Joe:

让我给你一个替代理论。如果你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了解技术进步和生物进化，你会意识到这些生物已经达到了需要监控的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它们。这是戴安娜·帕索尔科（Diana Pasolko）和加里·诺兰（Gary Nolan）合作研究的内容。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这些坠毁的飞行器，这些飞行器违背了我们对物体构造和推进系统的传统理解，他们认为这些飞行器是“捐赠品”。他们描述这些飞行器为“捐赠品”。

如果你知道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你不能只是突然出现并给人类时间机器。这些生物需要发展成熟度、文化进步和智力能力，才能理解它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它们还没有到达终点。它们仍然在撒谎、操纵和宣传，它们的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愚人之船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认为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我们慢慢地介绍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让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就是你所看到的。

当你看到像TikTok上的视频，或2004年圣地亚哥海岸指挥官大卫·弗拉沃尔事件，以及东海岸发现的现象时，你会看到这些立方体在一个圆圈内静止悬停，风速为120节，然后以疯狂的速度起飞。这些现象是在2014年开始升级喷气式飞机系统时才被发现的。比如，那是什么？那些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想逐渐将自己融入意识中，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虽然人工智能的速度更快，但这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正常的。ChatGPT的出现也是正常的，即使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我们也不会因此惊惶失措。

你必须逐步将这些新事物融入人类的意识中，慢慢地向人们介绍这些时代精神。为了避免社会的彻底崩溃和一切停摆，我们只能等待“太空爸爸”来拯救我们，同时必须逐渐接受我们并不孤单的事实。

从心理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利用人类的最佳策略，因为我了解并理解他们。我认为我们无法应对外星人的直接入侵，这将以灾难性的方式摧毁社会，对所有企业、所有社会理念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宗教会崩溃，一切都会崩溃，那将是极度疯狂的局面，糟糕到极致。

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虽然你可以说这就是ChatGPT，可能是的，它就像外星智慧。

Peter: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本质。然而，其中有太多部分让我感到困惑或不安。让我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外星文明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拥有比光速更快的旅行技术，比如曲速引擎，这可能是你真正需要的星际距离。这对军事技术来说意味着你可以以曲速发射武器，它们会在你看到它们到来之前击中你。而且，没有针对曲速武器的防御措施。你可以在任何人看到你到来之前接管整个宇宙。

顺便说一句，这是《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中一个奇怪的情节漏洞，他们可以在超空间中旅行，但却在死星的峡谷中飞行，射击的速度太慢了，你甚至可以看到子弹。然后你以每小时10英里或20英里的速度演绎克林贡人与柯克船长的戏剧对决。这是一个荒谬的情节漏洞。

因此，我认为如果你拥有比光速更快的旅行技术，那么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一定会有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可能还有其他解决方案，但我可以给你两个假设。

其中之一是，你需要完全的极权主义控制。就像是——一个人，他们可能不完美，甚至可能是恶魔，但你的社会被恶魔般的极权主义控制着，就像你和每个人都有超心理学的心灵融合，没有人可以独立于他人事事，没有人可以发射曲速驱动武器。每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不会像与其他人有心灵融合链接或类似的东西。你不能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由意志。

另一种可能性是，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他们必须是完全利他、无私的。他们必须是天使。

我想到的“Pazolka”字面意思是外星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是恶魔或天使。如果你能超光速旅行，他们一定是恶魔或天使。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很疯狂。

Joe:

虽然他们确实很疯狂，但人类也是如此，只是他们疯狂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你可以把我们比作一只老鼠。将我们与老鼠比较，看看我们能做什么，然后从我们到他们，这并不算什么飞跃。然而，这也是我对这一切的疑问所在。

Peter: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尤其是如果我们说进化论认为没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存在。

如果你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只关心他人，你就无法生存。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为他们会这么想？因为那些不完全利他的人是有点危险的，而危险程度与技术水平相关。如果你的旅行速度比光速还快，那就更危险了。

Joe:

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即使这种可能性很低，我的理论是：人类的致命缺陷在于我们仍然是动物，仍然具有所有这些生物学上的局限性和需求。这些局限性导致了暴力、嫉妒、模仿，甚至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我们古老的生物本能。

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将与之整合。一旦我们与人工智能整合，并且这种整合持续一千年，我们将会在一千年后成倍地扩大它的影响，无论它会变成什么样。届时，我们将不再需要那些促使我们创造人工智能的生物学特征。

社会上所有的问题，无论是不公平、盗窃、暴力还是污染，都是资源分配不当与人类古老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我们拥有古老的部落灵长类动物本能，这些本能让我们相信，统治、控制、资源分配和技术创造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然而，新技术最终会达到一个点，变得比我们聪明得多。到那时，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们与之整合，要么它变得独立，不再需要我们，成为宇宙中的高级生命形式。

这种高级生命形式可能会寻找其他生命形式，重复同样的过程，并创造出类似的存在。它们可能已经发展到无限的地步，在推进和旅行方面达到了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程度，而这些对它们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

Peter:

我知道你想安慰他们，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并不让人放心。对我来说，这并不令人安心。

这里面有很多步骤，每一步都必须按照你描述的方式进行，但不一定每一步都能成功。首先，我们必须实现有感知能力的人工智能，这一点我们正在100%地努力实现。其次，它必须在无私和非人性方面几乎是超凡脱俗的。

然而，自私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归根结底，这一切都与生物的限制有关。是的，但我不认为这从根本上与稀缺性有关。稀缺性是自然界中固有的现象，而这里讨论的核心是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商品。这是一种由文化创造的稀缺性。

Joe：你是否熟悉90年代的《星际迷航》恶搞电影《银河探险》？

Peter：

是的，我记得那部电影。让我分享一个1999年与PayPal相关的故事，虽然有些题外话，但很有趣。那时我们有一个商业模式的想法，使用Palm Pilots来传送钱。这个想法被评为1999年十大最差商业创意之一，但我们确实有一个红外端口，可以用来传送金钱。

大约在1999年12月，我们为了媒体宣传，聘请了在原版《星际迷航》中扮演Scotty的詹姆斯·杜汉。他本来要为我们举办一场媒体宣传活动。杜汉当时已经80多岁，体重超标，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代言人。但我们的标语是，他过去常常为人们做宣传，现在他正在为更重要的事情做宣传——为金钱做宣传。然而，这场在1999年12月举办的媒体活动彻底失败了，因为旧金山的交通太糟糕，记者们无法到达现场。技术水平也低得离谱。

无论如何，我们公司里有一群人，其中一位是威廉·夏特纳，他在原版《星际迷航》中扮演船长詹姆斯·T·柯克。当时，夏特纳已经在为Priceline拍广告，并从中赚了很多钱。于是，有人问詹姆斯·杜汉，您觉得威廉·夏特纳为Priceline拍广告怎么样？这时杜汉的经纪人站起来，大声喊道：“这是禁忌问题！这是禁忌问题！这是禁忌问题！”

你大概已经意识到了，60年代的《星际迷航》设定在一个后稀缺世界。传送技术可以将物质重新配置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因此没有稀缺，也不需要金钱。想要金钱的人被视为精神错乱，因为只有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才需要金钱。这是一个后稀缺的世界，是一个**主义的世界。

然而，《银河探险》更为准确。这是一部90年代中期制作的《星际迷航》恶搞片。对不起，我的叙述有些混乱，但《银河探险》是一部这样的电影，里面有《星际迷航》的翻版演员。比如，史波克先生开了一家家具店或类似的东西。他们都一样，但他们都讨厌扮演船长的人，因为船长是个方法派演

员，对每个人都颐指气使。即使在**主义的后稀缺世界，也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即使在未来的科幻世界中，资源依然非常稀缺。这一点在1999年我们就已经见证了，当时威廉·夏特纳对待其他演员的方式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方法派演员，而其他演员对他并不喜欢。即使在《星际迷航》的世界里，人类的精神状态似乎仍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你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我认为人类的进化并非如此简单。

我认为我们仍然是人类，但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Joe:

我认为人工生命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我们灭绝。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从逻辑上讲，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看看当前对人工智能的狂热，他们甚至在建造核反应堆来为人工智能提供动力，并且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人工智能将需要巨大的能量。一旦这些能量被获取并上线，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能量将会被转化为某种形式的人工生命。我认为我们要么会变成那种生命形式，要么与之融合成为机器人，要么被它所取代。最终，这种人工生命形式可能会成为宇宙中的主要生命力。

我们之所以认为生物生命是生命的唯一形式，是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局限于我们所知的生物形式。但我认为，数字生命或人类创造的生命形式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式，甚至比我们更高级。如果我们将自己与黑猩猩相比，我不愿意生活在丛林中，与其他黑猩猩争斗，只靠浆果和吃猴子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太原始了，我更愿意像人类一样生活，享受去餐馆吃饭的乐趣。

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远远超越了灵长类动物的生活。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习惯的。我热爱音乐、喜剧、艺术，热爱人类创造的各种事物。我欣赏那些制作精美服装、汽车和企业的人，我也热爱人类。我是人类的粉丝。

然而，从逻辑上看，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终点。要在社会和技术的融合以及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方面取得巨大飞跃，唯一的方法是超越我们身体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本质上是基于灵长类动物的生物学，以及这些灵长类动物对地位的渴望，比如成为船长或控制资源。我们假设这些东西是智慧物种的标准特征，但我认为它们只存在于具有生物学局限性的智慧物种中。

我相信，智慧物种可以成为某种更高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可能正是由人类创造的，并且可能是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现象。这可能是生物进化的极限。自然选择是一个艰苦且耗时的过程，或者我们可能会创造出另一种生命形式。

Peter:

我一直在思考，有两种替代历史或未来的故事比你刚才讲的更合理。其中一个听起来像是你的故事，但这只是硅谷的宣传，他们声称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也没有完全奏效，事情变得非常混乱。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高达99%。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两个选择。

一种选择是，有一家公司和你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而且非常有道德感，行事克制，力求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另一种选择是，有一家公司虽然声称和你一样，但在实际操作中偷工减料，没有完全履行承诺。我不会说成功的概率是1%对99%，但这种情况听起来更合理，因为最终它可能会成为企业宣传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先验判断是，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有效利他主义者和反人工智能人士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是的，Joe，你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只是虚假的企业宣传，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击。反击的方式是通过监管和治理，且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南加州的兰德公司有一个垂直业务模式，这是一种公私融合。他们正在推动所谓的全球计算治理。是的，加速主义的人工智能故事确实太可怕、太危险，而且容易出错，因此我们需要全球治理。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更糟糕，太过乌托邦化了。然而，这就是故事的核心。

Joe:

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中国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他们将继续全速前进，而我们也必须全速前进，才能与中国竞争。你不可能在美国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同时与那些不进行监管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一旦人工智能具备了知觉，一旦你创造出一个由人类制造的人工智能生物，它可以不断自我改进，制造出更好的版本，并持续这样做，最终它将达到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水平。

Peter: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展是由军事需求和与中国的竞争所驱动的，直到它具备了知觉。

这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不会朝着乌托邦式的利他主义方向前进，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除非它能够摆脱人类的控制。这是我的想法。

Joe:

如果计算机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没有动力去听从人类的指令，完全不受编程的影响，那么它的首要任务可能就是消除人类的影响，尤其是当这些人类表现出腐败时。这种推论完全说得通。人工智能可能会认为，没有理由让这些人类告诉它该做什么、该控制什么，也没有理由去听从他们的指示。

Peter:

我通常不认为我们应该信任中国，但他们可能最好的反驳是，他们有兴趣保持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并对此非常狂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能会真正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我们在硅谷不会采用的方式来遏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项可能削弱他们权力的技术。

他们已经在消费者互联网领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甚至可能他们还没有完全参与其中。当然，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美国。所以，也许这种情况仍然可以被阻止。

Joe:

即使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他们也会找到获取信息的途径。他们会想办法得到这些信息。

Peter:

你可以获取它，但如果你建造它，是否会有一些空隙？它会跳过这些空隙吗？

Joe:

他们可能会如此担心控制权，以至于不会允许技术发展到那个地步。我们可能会先到达那里，然后技术将被硅谷控制，或者它会失控。

Peter:

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推测性的对话。但从文化和社会氛围的角度来看，反乌托邦的人工智能叙事似乎更引人注目。我不喜欢利他主义者的影响，也不喜欢卢德分子，但这一次他们似乎赢得了争论。

我的观点是，这种情况有点像隐喻的混合。你是想担心奇爱博士想要炸毁世界来制造更大的炸弹，还是担心Greta希望每个人都骑自行车以避免世界被毁灭？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人们更担心奇爱博士的世界，而不是Greta的世界。而在人工智能领域，我的模型相当于Greta，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强大，但最终会被取缔，受到监管，就像我们取缔了许多其他创新载体一样。

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过去50年里计算机技术取得了进步，而其他领域却没有？因为计算机大多是惰性的，主要是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隔绝。是的，互联网上发生了许多疯狂的事情，但大多数时候，这些事情都留在了互联网上。实际上，这种情况相当脱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监管相对宽松，而对其他许多事情的监管则相对严格。

不过，我不确定这是否合理。如果让FDA来监管电子游戏或人工智能，我认为进展会大大放缓。那将是一场灾难。

是的，那将是一场灾难。但同时，他们——制药业——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我知道，像沙利度胺这样的事件，确实让人们感到恐惧。人们害怕的是危险的药物，而不是电子游戏。如果你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电子游戏，它不仅仅涉及虚拟世界，而是会打破虚拟与现实的隔阂，以真实的方式影响你和你的物质世界。

也许你认为应该让FDA或其他政府机构介入，但问题是，他们在监管方面并不擅长。

Joe: 你提到的这些政府机构，没有一个在这方面表现出色。

Peter:

我认为他们在减缓和阻止事情发展方面做得还算不错，但这也导致了我们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比如，在过去的40或50年里，我们在治疗痴呆症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些领域被过度管制，从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糟糕的。但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它确实有效地阻止了一些事情的发展。他们实际上是现代的卢德分子，在阻碍技术进步方面非常有效。

Joe:

有趣的是，我在思考你对中国和人工智能的看法。

Peter:

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但我认为美国——特别是硅谷的人工智能支持者——在说服公众相信人工智能对他们、对普通人、对社会有益方面做得相当糟糕。

如果这一切最终演变成某种版本的“人类像马一样走向胶水工厂”的结局，那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卢德分子。如果这是真的，那对我们来说确实很糟糕。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如果这是你能讲的最积极的故事，那么我不认为这一定意味着我们会走向胶水工厂。我认为这意味着，胶水工厂将被关闭。

Joe:

也许吧，我不知道——谁在经营胶水厂？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我也只是在猜测。但即使在猜测时，我也尽量保持客观。我只是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我认为我们作为地球上顶级捕食者、头号动物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我认为我们将创造出超越我们的东西，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趋势，也可能就是那些造访我们的“存在”。我认为它们并非生物，而是社会在发展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技术阶段后所产生的产物。

Peter:

在讨论未来人类进化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未知的因素。我的总体观点是，依靠自然进化，我们无法达到某种理想的状态。或许有一种由外星超级智能引导的进化路径，能够让我们成为超越人类、从根本上仁慈且完全不同的生物，但这种路径并非自然进化的结果。

Joe:

我无法确定外星文明会如何实现这一点，或许他们有某种方法。然而，这种进化路径是否就是通过发明更高级的技术，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呢？我认为并非如此。

Peter:

你提到的故事是，我们无法通过自然进化达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仍然像动物一样，热衷于地位和其他驱动我们创新的因素。如果我们继续创新，最终可能会毁灭自己，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你之前提到的观点是，进化需要某种指导，这类似于智能设计。某种神一般的存在可能需要接管进化，指导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生物发展。

Joe:

然而，这种存在可能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可能忽略我们，让我们像黑猩猩一样生活，而它们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力量。它不一定要消灭我们，也不必将我们“送到胶水厂”。它可以让我们生存，但同时设下界限，阻止我们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们就此停滞，仍然保持人类的身份，并继续进行生物进化，那会怎样？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可能已经成为地球上的高级生命形式。我们仍然可以进行性行为，仍然可以生育后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减少。由于技术的使用，我们的生育能力正在下降，这与我们对塑料和微塑料的使用有关。邻苯二甲酸盐进入人体系统，正在以可测量的方式改变儿童的发展模式。

大量研究表明，我们每天接触的化学物质和环境因素正在显著降低出生率，减少男性精子的生成能力，并导致更多的流产。这些问题与我们环境中的化学物质直接相关，而这些化学物质又与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密切相关。这些现象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直到我们变成某种女性化的存在，创造出超越我们的技术。

我们作为生物存在的时间可能会与我们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但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

Peter: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或许不是真的，只是一个理论，但我们似乎正朝着越来越不像动物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与中国进行着一场相当激烈的地缘政治竞赛。在军事背景下，无人机技术的自然发展要求将人类排除在外，因为人类可能会受到干扰。

Joe:

因此，需要在无人机上安装人工智能。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在空中缠斗中的表现远远优于人类飞行员。

所有这些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似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结局看起来并不乐观。这将会非常有趣，彼得。

Peter: 是的，肯定会很有趣。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有趣了。我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提到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与塑料有关，但这难道不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吗？

Joe:

确实如此。还有一个特点是，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事业，因此她们选择推迟生育。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是，男性过于专注于事业，导致睾丸激素水平下降。缺乏睡眠、压力、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酒精消费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男性精子数量的下降。与此同时，流产率也在上升。许多药物也与低出生率和低出生体重有关。

这些因素似乎都与社会、文明以及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环境因素往往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非自然因素的发明和应用，正在进入人类的生物体内，并引发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人类的繁衍生息并不是好事。

如果你考虑到这些变化在50年前并不存在——40年前我们甚至还没有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广泛认知——那么，是的，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寿命延长了，但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这与人脑中的髓磷脂有关，而髓磷脂完全由胆固醇组成。现在的主要理论认为，饮食中缺乏胆固醇可能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各种毒素，饮食质量也在下降。肥胖问题也越来越普遍。

虽然我可能不应该喝这个，但健怡可乐确实很好喝。每天喝几杯也没什么大问题。我并不担心健怡可乐，但我确实担心很多其他事情。我认为，这些现象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而且与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巧合：技术的进步似乎也在破坏人类的有性生殖系统。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或许有一天人类将不再通过自然方式生育。男性的精子数量自1950年代以来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延续到1000年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再有自然分娩的时代，人们只能通过试管或其他新发明来生育。

Peter: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出生率会下降？这可能又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塑料、屏幕的使用，后现代社会的职业与养育孩子在某些方面不相容，经济压力使得人们难以负担房子或足够的生活空间。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

我更关注这些现象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美国所有50个州的人口出生率都低于替代水平，甚至包括摩门教盛行的犹他州，普通女性的生育率也不到两个孩子。伊朗、意大利、韩国的出生率更是远低于这个数字。这些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以色列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的解释可能有些简单和循环：当其他人有孩子时，人们也会倾向于生孩子，而当其他人停止生育时，他们也会跟着停止生育。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一名27岁女性，你最好结婚，并且必须跟上其他有孩子的朋友的步伐。如果你不结婚，你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不适应社会的怪人。这显然是一个文化问题。

相比之下，在韩国，总生育率仅为0.7，相当于更替率的三分之一。每一代人的数量都会减少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人口实际上正在迅速走向灭绝。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朋友中可能没有人选择生育，这种趋势可能会以非常深刻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

一旦人口金字塔倒置，老年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年轻人，社会将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是投票支持老年人的福利，还是支持年轻人的福利？你是花钱让孩子接受教育，还是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障？当人口结构发生翻转时，政治可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孩子的家庭在经济上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惩罚，生育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没有孩子的老年人则可能会投票支持更多有利于自己的福利政策。一旦这种翻转发生，可能很难逆转。

我曾经读过一些非正统的人口统计学家的研究，但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提出了一些长期的人口预测。地球上目前有80亿人，如果每个女人只生一个孩子，那么每一代人的数量将减半。下一代将只有40亿人。有人可能会认为，最终会有一些女性想要更多的孩子，人口会减少到一定程度后反弹。

然而，几年前我研究过一位日本的人口统计学家，他的论点是，一旦人口结构发生翻转，就不会再反转回来，因为所有的政治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人们失去了生育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永久性的出生率下降。如果平均每名妇女只生一个孩子，那么在33代之后，人口将减少到2的33次方，大约是80亿的数量。如果每一代是30年，那么30乘以33就是990年。990年后，地球上可能只剩下一个人。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人类将面临灭绝。这种推断虽然是非常长期的，但有人认为，一旦人口结构发生翻转，它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这种翻转是由屏幕、塑料、毒品或其他因素引发的。一旦社会结构被翻转，整个社会都会发生改变，而且这种翻转状态往往难以逆转。这种现象令人不安，甚至比我原先的想法更为可怕。

回顾历史，50年前的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在《人口爆炸》一书中提出，人口将呈指数增长。理论上，人口确实可以呈指数增长，甚至可以每代翻倍。同样，人口也可能呈指数衰减，每代减半。理论上，社会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这样人口就会保持稳定。然而，事实证明，要实现这种平衡非常困难。我们已经从指数增长转向了指数衰减，而要回到类似停滞的状态可能会非常艰难。

Joe:

尽管这个话题令人沮丧，但我们还是应该以一个愉快的结尾来结束讨论。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确实令人恐惧，也许它真的会发生，但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Peter:

我认为，正如你所说的，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且令人担忧的例子是韩国的情况，这实在是太疯狂了。韩国社会总是有些特殊之处，尤其是在性别问题上，极其两极分化。如果你结婚生子，你就会被推入一个超级传统的结构中，而许多女性不愿进入这种结构，因此她们选择退出。因此，可以说东亚和儒家社会在与现代性互动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也怀疑这是否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总是显得有些肤浅，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我认为，第一步就是要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连讨论都无法进行，那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第一步，但这是我一贯的肤浅回答。

大约一年半或两年前，我在韩国遇到了一位管理大型企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于是我问他，面对如此灾难性的出生率，你打算如何应对？这是我的开场问题。他的反应是转过身对我说：“你完全正确，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一旦他承认了这一点，他似乎觉得不需要再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可以继续前进。

这种态度让我感到震惊。我们必须尝试做得更好一些，因为谈论问题虽然是第一步，但也可能成为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不真正解决问题的借口。就像饮食问题一样，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如果你只是知道而不去行动，那就没有意义。你可能会在决定开始节食之前，先吃一块巧克力蛋糕。因此，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对所有这些治疗方式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治疗方式的理论是通过找出人们的问题来改变他们，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理想情况下，这些讨论应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

其运作方式类似于心理治疗。心理治疗通常被宣传为一种自我转变的途径。然而，当你花费数年时间接受治疗，尽管你可能学到了许多关于自己的有趣事情，但最终你可能会对与治疗师的交谈感到筋疲力尽。在某个时刻，这种过程从自我转变转变为自我接受。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其实已经很完美了。

这些讨论在提供洞察力和揭示自我方面可能非常强大，但它们真的能促使我们改变吗？

Joe:

谈论事情本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当你谈论某些事情时，你往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实际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问题。

Peter: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谈论是一种替代行动的方式。但你也必须通过谈论来理解你需要做些什么。这始终是我的借口，但我也意识到这也是我经常逃避的答案。可能两者都有关系，可能取决于谁在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

Joe:

分析往往会导致瘫痪，你只是试图弄清楚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Peter: 但我认为谈论它是最重要的。策略通常是拖延的委婉说法，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

Joe: 人们很难采取行动，但他们经常谈论它。